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9月30日第25期 总第23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35期

【专稿】

陆 凌 前世与今生

——读文浩的《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

【西学】

(德) 文 浩 (Felix Wemheuer)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前言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终章与结论

附：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目录

【序跋】

何 方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卷首语

孙国光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序——读韦文德回忆录有感

【怀人】

朱 正 增德兄纪念

佚 名 文革第一遗书——雷扶九校长殉难50年祭

【述往】

王 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中）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情爱篇（2）

【读者来信】

1. 胡 杰：234期的封面设计很有创意
2. 梁幼志：抄录彭丽君书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享
3. 刘敏华：《教育叙事》中的白璧微瑕

【本刊声明】

【专稿】

前世与今生

读文浩《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

陆凌

第一次在手机上完整地读完一本书，虽然读得比较仓促，注释部分也没能看，由于对饥荒专题一直关注，加上文浩选题的角度新颖，开卷有益，收获良多，遵嘱写下这段推介，也算是有感而发。去冬今春，读了安妮-阿普尔鲍姆写的《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当时就觉着，如果能够认真地比较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乌克兰大饥荒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异同点，会非常有意义。文浩的这本书深入而系统地比较了这两次饥荒，在此基础上，突出地研究了大饥荒对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他还特别明确地指出，苏联在1948年、中国1962年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饥荒，“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在避免饥荒方面的成功，说明将饥荒的发生归咎于缺乏民主过于简单化”¹。读文浩的书，非常欣赏他的冷静理性和自信，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实地呈现出来，不迎合政治，不顺应潮流，不忌惮权威。也许这本是学者的基本素质，在今日之中国，已因稀少而成珍品了。

1. 乌克兰饥荒与中国大饥荒的异同点——前世与今生

苏联在1931-34年发生了大饥荒，全境约500万人饿死，其中有390多万人是乌克兰人²，故此次饥荒又称为乌克兰大饥荒。中国在1959-61年发生了大饥荒，最保守的估计约

¹ 文浩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221。

² Red Famine-Stalin's War on Ukraine, by Anne Applebaum, Preface, published by Doubleday, New York, 2017

1500万人饿死，而为中外史学界普遍接受的数字是约3000万人饿死，其中藏族人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中共始初把此次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口为“三年困难时期”，现在通常被称为“三年大饥荒”。

两次饥荒的肇因基本相同，均为大跃进饥荒：农业集体化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工业大跃进导致粮食消费剧增、农村劳力骤降，危机面前，两国中央政府反应迟缓，不仅未能及时调整粮食购销政策，停止粮食出口，减少工业投入，反而变本加厉剥夺农民，以反瞒产的名义，继续强制征购农民的口粮、种粮，粮食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两国共产党政府均以保证城市粮食供应为先，牺牲农民，甚至以武力限制断粮农民逃荒自救。

饥荒发生的时间基本都在两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十年左右，两国共产党政府在饥荒发生时，均对外界保守机密，均不寻求国际援助，而且，其后均把对于各自大饥荒的研究视为禁区，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人无法公开追悼饥荒中的受难者，在中国，至今还不能对于三年大饥荒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也无法公开地追悼在三年大饥荒中无辜受害的几千万农民。

两国终止饥荒的手法基本相同：两国政府均调整了与农民的关系，对农民做出开发自留地等重大让步，“农村不再是国家挤奶的奶牛”¹，苏联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而中国在1961年也不得不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几百万吨小麦，陆续遣散两千多万城市人口，以缓解粮食的供应危机。

两次大饥荒比较明显的不同点：在乌克兰大饥荒之前，没有冉冉升起的粮食高产卫星，也没有曾经遍布中国农村乌托邦的公共食堂。毛泽东曾经豪情满怀地在赫鲁晓夫面前炫耀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斯大林好像从来没有苏联的粮食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的幻觉。无论如何，按当时两国农村人口总数予以估算（不太清楚1930年代初苏联农村人口总数，这里按一亿农村人口约略估算，请专家们原谅我的草率），两国农村人口约5%被饿死了，这是大跃进的代价，是两国快速工业化的已付成本，是社会主义强国梦的牺牲品。

问题是：农民也好，工人也罢，都是新社会的公民，凭什么要牺牲农民，优待工人，

¹ 文浩著，页211，页212。

牺牲农业，发展工业？！

文浩在书中一再提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源于城市，苏共在农村的根基薄弱，而中国革命发端于农村，中共在农村根基深厚，为什么中共与苏共走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以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粮食危机面前，两国共产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牺牲农村拯救城市，用农民的命换城市居民的苟活。如此做法的目的是为了稳固政权、保持统治地位，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考量，但究其根本，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是马列教义改造社会的自然应用：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代表了落后，是封建主义的象征，以落后的农业为代价，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剥削农民，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抉择，这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好坏、与农民有无深厚的历史渊源无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自认为掌握了先进理论的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改造社会，输出革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让农民做出一点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1949年以后，中共外交政策一边倒，与苏结盟，以俄为师，其实是以“饿”为师，两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两个独裁者的主导下，排斥党内异己，奉行马列原教旨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强国梦的名义，强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大幅度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及粮食产量，对本国农民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剥夺，两个国家一前一后走上了大规模饥荒的不归路。苏联的前世就是中国的今生，这是信仰并实践马列教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研究大饥荒的根本意义所在，前事不忘，才能成为后事之师，否则，历史终将重演！

2. 乌克兰饥荒是“饥荒中的饥荒”¹

不应与西藏的饥荒相提并论

¹ Anne Applebaum, Chapter Eight

文浩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约三成）比较了乌克兰与西藏的饥荒，虽然他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毛泽东用粮食作为武器，对乌克兰或西藏的民族主义者进行打击，对两个民族实行“饥饿大屠杀”（Holodomor），我还是要在这一特别指出，以研究饥荒的名义，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与藏汉两族的矛盾相提并论，就是把饥荒研究政治化，是不合适的。

前文已经提到，1931-34年发生在苏联的大饥荒，将近80%的受难者是乌克兰农民，相对而言，如果我们用“三年大饥荒”中饿亡中国农民最保守的估算-1500万人进行比较，其中饿死的藏族人为2%左右。当然，每一个生命都是极为珍贵的，我们绝对不能说饿亡的三十万藏人因为数字相对较小而无足轻重，但是，在一个跨度长达三年、遍及中国境内每一个省份、每一个乡村的严重饥荒中，几千万人默默地饿死了，这里没有民族的歧视，也不分高低贵贱，生或是死，基本取决于有无城镇户口，是农民或乡下人，还是工人或城里人，与他们是汉族、苗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或维吾尔族无关，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二元社会中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¹。在这场巨大的悲剧面前，我们至今无法正视它的真实肇因，我们还不能公开地悼念凄惨死去的亲人，更不能追究罪魁祸首的责任，就让我们闭目追思，默默哀悼，愿无辜受难的亲人同胞安息，不要用不甚相关的噪音打扰他们。

不能同意把乌克兰饥荒与发生在西藏的饥荒相提并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要贡献苏联粮食收购计划的37%²，乌克兰真正是俄国的大谷仓，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谷仓。

我有一个藏族朋友，提到文革期间藏传佛教寺庙遭到大面积毁坏，愤愤不平，我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全中国，奉行极左路线的共产党人，是马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政教合一，以实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大同的名义，反对一切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文革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灾难，不是针对藏族一个民族的，我的朋友看着我，一

¹ 《人物周刊》总第299期，2012年5月21日，页38。

² Anne Applebaum, Chapter Four

字一句地说，我不管你们中国人是怎么糟践自己的，如此对我们藏族，毁庙灭教，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完全同意文浩的结论，毫无疑问，两次大饥荒的苦难经历，强化了乌克兰和西藏两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民族政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它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藏族人、和汉族人背负至今。这是大饥荒的衍生后果，我们无法忽视，尽管它不是大饥荒研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专题。

3. 民主和新闻自由也许不是消除饥荒的必要条件， 但一定是防止大规模饥荒的充分条件

限于篇幅及水平，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阐述，但还是忍不住把它列出来。我明白文浩先生的本意是科学理性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 饥荒是怎么发生的，... 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如何避免了饥荒。”¹ 但我就是不能平静地接受这种仿佛为专制辩护的理性。

五年前，读冯克的《毛的大饥荒-中国最严重灾难的历史，1958-1962》，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作者是严谨认真的，所用的资料有些来自原始可靠的档案，所做的分析有些也是比较独到的，所得出的结论同样也是触目惊心的，但他无法打动我，说服我，更不能感染我。作者就像一个客观而冷漠的医生，对病人的症状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做出了专业的诊断，可他的描述却无法说服病人的家属。是因为他过于理性，还是因为我们过于感性？是因为他的局外人身份，还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

在含泪阅读刘庆邦先生的《平原上的歌谣》的同时，几乎能够想象出作家含泪写作这些片断的场景，他用近镜头、特写的方式，直播麻表哥一家四口之死、妹夫之死，场面凄惨悲凉，让读者（应该是观众）直面饿殍，惊诧莫名，同时感到万分悲伤，潸然泪下，愤懑不平！让人们忍不住发问：为什么如此凄惨？为什么饥荒如此严重？为什么饥民如无头

¹ 文浩著，页 207。

苍蝇一样在饥饿的大地上漫无边际地走向绝望和死亡？这一切在民主的、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会发生吗？我当然明白文学与学术研究的区别。

4. 让我心存敬意的作者

对于研究“三年大饥荒”的专著，我总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通常而言，作者中，外国学者多，国内的学者少。每次读完国外学者的相关专著，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慨，何以一个外国人，对于这么艰难、敏感、阴暗而沉重的中国问题，有如此执着、深刻、独到地研究？贾斯柏-贝克、冯克、麦克法夸尔等人的相关著作都让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特别的敬意，虽然他们的著作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当然，也有国内的学者对三年大饥荒做了全面、认真地研究，写出了鸿篇巨著，这里也同时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敬意！我还要特别地呼吁，亲身经历过那个饥荒年代的文人学者，应该学习刘庆邦先生，用心血写出那个时代的悲歌，为历史作证，毕竟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痛史，不该老是依赖外国学者写一些不关痛痒的诊断。

读了文浩的这本书，让我心存敬意的外国学者又多了一位。他们的饥荒研究极其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他们秉笔而书中国人所不能书，仗义执言中国人所不敢言，每个有良心、有历史感的中国人都要感谢他们！为此，我特别推荐德国学者文浩先生所著《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繁体中文版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发行的。目前我只有手机微信版，读起来比较吃力。尝试在美国亚马逊网站（Amazon）上购买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发行的英文电子版，发现电子版比纸质版要贵很多，那就稍等一段时间，以后买一本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再认真阅读所有章节，包括注释。■

【西学·序跋】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

中文版序

(德) 文浩 (Felix Wemheuer)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我常常在想,我怎样才能对这一研究做出贡献。我喜欢选择一些很多中国学者不愿或不敢选择的题目。2000至2002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产生了兴趣。人民大学两位教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问题课程的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采访人民大学几位1958年被派到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支持大跃进的退休教师,这些教师曾去过这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转型”模范试点,并对此记忆犹新。但是直到后来与村里的老农攀谈,我才意识到,对这些农民来说,那场饥荒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痛苦和深刻的记忆。他们幸存了下来,但他们直至今日没有一天不想着要有足够的粮食。与农村的情况不同,在城市,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其更多的是关于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而不是饥荒。1959至1961年,饿死的大部分是持农村户口的人,而重点城市的人则受到了保护。

2004年我开始以河南农村对饥荒的记忆为题写博士论文,当时中国和西方都很少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在饥荒时饿死近一百万人的河南省信阳地区进行实地采访,其中有一个村子所有的年轻人都逃难到青海,留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都饿死了。采访时,一些人说起那时的艰难和悲苦都忍不住落泪。那时我就想,口述史是记录下这些声音的最好办法。与城市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不同,农民的记忆和叙述较少受官方历史观的影响。他们从未提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左倾错误”。他们直言不讳地谈及偷粮、逃难和虚报产量。地方干部也不否认他们可以比一般老百姓多弄到一点粮食。2006年我以题为《掺石头的面：河南省对大跃进饥荒的官方记录和农民记忆》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我想,我再也

不研究这个令人痛苦的题目了。

可是,当我阅读了有关苏联 1931 至 1933 年斯大林时期饥荒的书籍和材料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很明显,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处置不当,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导致了饥荒。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同样将国家带向了饥荒呢?是苏联计划经济式的体制和社会主义农业导致了灾难吗?为了对这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开始在宏观的层面进行比较研究。2009年,斯蒂芬·维特克罗夫特(StephenWheatcroft)教授也有同样的研究兴趣,并且在墨尔本大学组织西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学者就两国的饥荒举办研讨会。即使早在那时,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紧张局面就已经很明显。乌克兰官方对 1931 至 1933 年饥荒的说法是,那是斯大林组织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这是苏联所有各民族经历的一场灾难,乌克兰的饥荒不是有意组织的。在 2009 年时,没有人会预见到乌克兰 2014 年以后会发生起义和战争。这本书里谈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建立了一种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以服务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如何书写和记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不仅要努力发掘“到底发生什么”,还要理解大众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里,我们纠正了原英文版中的一些错误。近十年来,大跃进饥荒问题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书籍,如杨继绳的《墓碑》。显然这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此书对苏联和中国的比较可以为饥荒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而饥荒问题与中国读者也密切相关。对于中文版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本书译者项佳谷为此付出的艰辛。我还要感谢中文大学出版社叶敏磊和杨彦妮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辛逸、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华东师范大学徐进、科隆大学景文玉、朱美婷和维也纳大学崔金珂对文稿提出的建议。■

2017年3月于科隆

【西学·书摘】

饥荒政治

——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终章与结论

(德)文浩(Felix Wemheuer)

孟子对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
‘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
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气，斯天下
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

终章

经验教训：苏联和中国如何避免饥荒

我们不仅应该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新的饥荒及饥荒是怎样发生的，还要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如何避免了饥荒。因为实际的情况是，苏联1948年和中国1962年之后没有再发生过严重的饥荒。由于中国曾经有过漫长的饥荒史，俄国和苏联历史上于1891、1920至1922、1931至1933和1947年都发生过大饥荒，我们不能将饥荒的消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现象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即共产党如何重新建构农民与城市粮食消费者的关系。得瓦尔认为，在非洲是因为各国政府采纳了建议，为避免这类灾难的发生与老百姓达成了共识，即一种政治上的协商一致。¹ 饥荒造成的丑闻及饥荒的政治化帮助挨饿的老百姓给政府施加一种压力。在民主社会比在非民主社会更容易建立这稀共识。但是，

如得瓦尔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达成这样的协商一致，民主权利并不能当然保证不发生饥荒。²他还强调，如果发生了饥荒，政府能公开承认饥荒十分重要。本章将讨论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何避免饥荒。首先要讨论的是，共产党与老百姓是否建立了这样的共识。然后我要介绍，这两个国家都调整了与农民的关系。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并且在农村建立了福利保障体系。在中国，政府看到防止城市化和实行计划生育是避免饥荒的重要手段。最后，我要对亚玛特亚·森关于民主对避免饥荒的重要性理论提出质疑。

防止饥荒的共识

共产党有没有与老百姓就防止饥荒达成了共识？裴宜理引用了近年出版的政府白皮书，并提出，直至现在，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为老百姓提供“生存权”的保障之上。³为了应对西方话语讨论所带来的挑战，共产党强调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生存权比政治权利更加重要。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日报》上找不到很多关于生存权的内容⁴。拉矢·塔克斯顿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未能就应对饥荒与百姓达成共识，因为1962年以后那些在大跃进中作恶的地方干部仍然在位，农民不信任他们，不愿与他们讨论今后如何避免饥荒。塔克斯顿认为，如果要就应对饥荒达成某种认真的共识，各级领导必须承认他们曾犯了错误，而且要有更公开和透明，支配粮食的权利要交给容易遭遇饥荒的农民。⁵塔克斯顿指出，在他蹲点进行研究的河南省农村，一些农民从最严重的饥荒中生存了下来，不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改革者进行了“行政干预”，而是他们自己的生存战略如偷窃和“吃青”。塔克斯顿认为，自从大跃进饥荒发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一直处在长期的危机中。实际上，返销粮食到农村和救灾援助都不是结束灾荒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措施的效果都相当有限。1961年返销量甚至从1960年饥荒高峰期的总量上降了下来⁶。

此外，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承认1931至1933和1959

至1961年发生了饥荒。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以后，中苏官方出版的教科书中，这些事件被淡化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缺点”和“左倾错误”，或者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⁷在这两个国家，只要谈论灾难的真实范围问题仍然是禁忌，就不可能由官方就应对未来的饥荒作出什么安排。在苏联，斯大林在世不可能就应对饥荒作出安排，因为1931至1933年的严重饥荒后，1947年又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不过中国1961年以后的新政策减少了农民的负担，接下来的几年里，农村的生产恢复了。这些政策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实行的。塔克斯顿说只有很少的地方干部因为其极端的做法受到惩罚，很多腐败的干部仍然掌权，他说的是对的。中央政府只是在表面上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⁸不言而喻，地方干部不可能和农民就应对未来的饥荒达成某种共识。

总的来说，塔克斯顿所谈论的官民应对饥荒的一致安排对于一党专制的国家可能时机还不成熟。与大跃进期间的报告相反，1962年之后，上级要求干部提交比较实事求是的报告，“卫星田”之类的极度夸张曾导致大跃进高峰期间制定了极高的粮食征购指标，这种现象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出现过。农民支配粮食的权利没有扩大，但是有了自留地，维持起码生活有了保障。1961年之后，地方当局对粮食生产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公社。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有生之年都没有在农村再发动另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调整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宏大远景，直到去世他对农业问题都十分小心……他再也不会推动将所有制转变为大队或公社所有。毛不再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推行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措施来提高农业产量。”⁹农村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而非国营所有，加上农民可有自留地）的做法未遭最高领导层的反对。¹⁰斯大林认为全国范围的农业全面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他看到，这只能在遥远的将来得以实现。¹¹自1960年代初期，苏联和中国对农村的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两个国家都能够避免饥荒的发生，这不仅仅是农业产量的提高能够解释的。

苏联应对未来饥荒的安排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提高了国家征购农产品的价格，减少了农民税收的负担，甚至取消对自留份地征税。评估收成的办法也改变了，取消了计算“生物产量”或者叫“作物根系的数量”计算产量的办法，根据地里庄稼最成熟时计算的产量要比谷子脱粒后计算的产量高得多，按照新方法计算的产量要比过去官方计算的产量低30%。这个改革在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¹²斯大林刚去世的几年里，农业生产从低谷开始上升。1954年粮食产量达到8,560万吨，但仍然低于俄罗斯帝国1913年战前的水平（8,600万吨）。1953至1958年，粮食和肉类人均产量增加了30%，牛奶增加了40%。¹³1958年粮食产量增至1.347亿吨。“赫鲁晓夫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推动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土地计划”，希望新开垦土地可以减轻传统供粮地区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负担。在刚开始的几年里，“新土地”的产量很不错，但是接着就开始下降了。

此外，集体化生产的生产力总体来说仍然很低。1960年和1961年粮食欠收使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出现危机。1962年6月，苏联政府决定将肉类和奶制品的销售价格提高30%，以控制消费。在新切尔卡斯克，因提价发生动乱，工人举行罢工。政府派出军队镇压抗议，20个工人被杀害。这些因提价而发生的动乱在苏联1953年后的历史中是关键性的事件，因为苏联政府此后20年没敢提高烘烤食物和奶制品的价格。¹⁵而与此同时，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好几次。收购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距成了政府巨大的负担。此外，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苏联政府在国际市场上收购了大量的粮食和肉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相安无事。

撒米尔·拜伦(Samuel Baron)的书曾以“血腥的星期六”为书名，这个事件发生于新切尔卡斯克，赫鲁晓夫对此甚是关心，但是1963年收成不好(1.075亿吨)造成城市和农村粮食紧缺，也促使了赫鲁晓夫第二年的倒台。土豆和蔬菜收成也很差，只达到了1955年的水平。左雷斯·梅德韦杰夫(Zhorcs Medvedev)认为，1963年可以上市的粮食比1955年多，

但是城市人口那时已经增加了 3,000 万，所以粮食仍然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¹⁶ 尽管供应高质量的食物存在问题，但没有受到严重饥荒的威胁。梅德韦杰夫这样评价赫鲁晓夫时代的粮食供应：“全国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饥荒的迹象肯定是一个成就。面包很便宜，且唾手可得，但是这对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来说是不够的。”¹⁷

在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农业生产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但国家对待农民的态度改变了。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是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在中国，共产党在饥荒之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而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1941 至 1945 年，大约 2,600 万人死于战争，其中大部分是农民。1945 至 1947 年，农村入伍的士兵中退伍后只有不到一半回到了农村。¹⁸ 在乌克兰直 1958 年才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则到 1971 年才恢复。由于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苏联西部地区的出生率在 1950 年代已经达到了世界上城市的平均水平。1950 至 1971 年，城市人口从 6,940 万增加到 1.388 亿。¹⁹ 此外，苏联中亚地区，这个粮食消费地区的出生率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由于大量人员离开农村，苏联领导人感到必须改进农村消费和基础设施。“从 1950 年代后期开始，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苏联领导人努力营造新的社会关系的一个中心内容，而增加食物供应又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内容。”²⁰ 赫鲁晓夫知道，不能再挤压农村了。只有将农村纳入社会网络之内，农业才能提高生产率，农村的城市化是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式。赫鲁晓夫希望，如果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住房、商店、剧场和公共设施，农民会放弃自留地。²¹ 而且，赫鲁晓夫时的领导层取消了强制性的粮食分配，让农民有更换工作的自由。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工资也有了极大的提高。²² 从 1960 年代起，苏联开始补贴农业。1964 年赫鲁晓夫倒台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领导的新政府希望对农业经济进行大量的投资可以增加产量，但实际上投资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有限。²³ 1976 至 1986 年间，总的来说，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²⁴ 但国家没有让消费者勒紧裤腰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进口了更多的粮食。1960 至 1973 年，从国外进口

粮食由 4,260 万吨增加至 9,920 万吨，国内粮食消费增长了 40%。²⁵即使进口粮主要用于城市人口和牲畜，这也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农村不再是国家挤奶的奶牛，但农业生产率仍然很低，农业补贴成了国家预算的一个负担。国家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为农业人口提供工资保障，到了 1970 和 1980 年代，农村人开始可以享受整个月的假期、112 天的带薪产假、老年退休金，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获益。虽然一般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时代，但从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中期，农村还是出现了社会变化和经济增长。²⁶1976 年之后，农村也发放了身份证。这使农村人行动更便利，也增加了提高农村生活水平、防止人口流入城市的压力。²⁷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领下，共产党与农民在自留地问题上相安无事。农业集体化数十年之后，农村人所消费的食物一半以上来自于自留地。1975 年，全国 95% 的土豆，34% 的蔬菜，31% 的肉类来自于私人耕种的土地。²⁸国家允许经营自留地是国家对农民的主要让步。

总而言之，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农业取得了一些进展。饥荒的威胁消失了。对很多经历了 1931 至 1933，1941 至 1945 和 1947 年饥荒的苏联农民和城市居民来说，战胜饥饿是相当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提到，苏联政府之所以能够保障供应，是因为有大量的粮食进口和对销售价格的高额补贴。梅德韦杰夫对斯大林时期和 1970 年后期的食物供应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1927 年至 1929 年，斯大林动用“特殊措施”从农民那里征购了 1500 万吨到 1600 万吨粮食来供应军队和 2870 万城市人口。而 1979 至 1985 年，国家平均每年从市场上购买 7000 万吨粮食。这个数字看上去是个极大的改进。粮食征购比 1929 年增加了 450%，但是 1986 年城市人口增加了 650%。此处工业也消耗更多的市场收购粮。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苏联每年要进口 3000 万吨到 5000 万吨粮食。

梅德韦杰夫认为，“没有这些进口粮食，苏联城市普通老百姓的饮食状况要比 1929 年还要糟粕。”²⁹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不挨饿，食品不匮乏也不是一定有保障的事。

粮食问题和计划生育

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都在为了工业的发展“挤压”农民，手段是统购统销、维持低粮价。³⁰应该提到的是，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54年的1.69亿吨增加到1976年的2.86亿吨。但是生产的成就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消耗殆尽。1954至1976年间，全国人口从6亿增加到9.3亿。其结果是，1970年代农村的平均粮食消费几乎与1950年代初期相同。到毛时代结束时，农民享用的细粮如大米和面粉比二十年前更少，他们吃更多的粗粮。³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没有导致严重的饥荒。派系斗争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存，但是农业管理没有落入党内激进派的手里。周恩来总理1966至1967年通过各种规定指示，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得扰乱工农业生产。³²中央委员会发布决定，禁止农民参加武斗，³³但是大规模的杀戮在农村还是发生过。³⁴虽然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内战不相上下，但党的领导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农业生产相对稳定的阶段，粮食征购率保持在平均每年22%（见表8.1），是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后最低的。农民的税收也维持稳定，与1950年代和大跃进期间相比是比较少的。³⁵这是农村所取得的胜利，但是给国家供应城市带来了问题。

我认为，执行认真的计划生育开始于1963年，这与饥荒和粮食问题相互关联。³⁶早在1950年代中期，党的领导就讨论过控制和计划人口的必要性。这一点领导人甚至毛泽东本人都看到，人口不受控制的增长会给未来粮食供应带来问题。³⁷但是，由于大跃进野心勃勃的工业化目标，宏大的建筑项目和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最后，毛泽东在1958年终止了这场讨论。³⁸接着而来的饥荒打破了农业生产可以在大跃进中得到提高、粮食问题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幻想。

尽管饥荒中死掉了千百万人，但中国总人口仅仅短时间内有所下降。1963和1964年，在经济复苏后中国出现了生育高峰。1964年人口达到6.91亿，而1958年只有6.59亿。就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1964年，国务院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

会。有意思的是，1963年在城市但没有在农村执行计划生育。先在城市开始，然后在农村推行试点。国务院领导如周恩来认为，新的政策在城市容易执行一些，因为城市妇女教育程度高一些、卫生保健条件好一些。³⁹天津是执行自愿绝育和流产政策的模范。城市执行计划生育可以减少农民的负担是一个重要的理由。比如，城市工作会议的一份文件就谈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减少农民负担；缓解日常供应以及住房、就读和其他城市管理设施的紧张。”⁴¹1963年7月，周恩来发表一篇讲话，认为有必要提出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他支持计划生育的第一个理由是，1957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不受控制的增长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⁴²第二年，计划生育推广到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公开发布的计划生育文件里从未提及饥荒，但是提到了粮食问题。⁴³

表 8.1 中国的粮食生产与销售（1966--1979）（吨）

年份	产量	销售总吨量	销售净吨量	占产量比例总	占产量比例净
1966	214,000,000	51,580,000/38,240,000		24.1	17.9
1967	217,800,000	49,355,000/37,740,000		22.7	17.3
1968	209,050,000	48,695,000/37,865,000		23.3	18.1
1969	210,950,000	46,675,000/33,825,000		22.1	16.0
1970	239,950,000	54,435,000/42,020,000		22.7	17.5
1971	250,150,000	53,020,000 /39,820,00		21.2	15.9
1972	240,500,000	48,295,000 /33,920,000		20.1	14.1
1973	264,950,000	56,120,000 /41,005,000		21.2	15.5
1974	275,250,000	58,070,000/43,975,000		21.1	16.0
1975	284,500,000	60,860,000/43,945,000		21.4	15.4
1976	286,300,000	58,250,000/40,720,000		20.3	14.2
1977	282,750,000	56,615,000/37,560,000		20.0	13.3

1978	304,750,000/61,740,000/42,710,000	20.3	14.0
1979	332,100,000/71,985,000/51,700,000	21.7	15.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辑：《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页410-411。

自1964年，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开始下降。城市的这两个数字1949年之后第一次低于农村。⁴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第一年新政策的执行受到干扰，但19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强化。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软性”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绝育和节育）仅仅减缓了人口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人口仍然在增长，从1964年的6.94亿增加到1978年的9.62亿，⁴⁵其中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没有在城市成功。1964至1976年，每个城市妇女平均生育小孩的数量从4.3下降到1.6，在农村从6.5下降到3.5。⁴⁶

防止城市化

根据大饥荒的经验教训，1962年至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户籍制度，以防止不受控制的城市化。领导们相信，城镇享有粮食供应的人口过速增长加重了农民负担、对大跃进期间饥荒的发生起了推动的作用。中国的城市化因此停止了几乎二十年。从1962年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城市化仅从17.3%上升至17.92%。减缓城市化的成功归咎于多项政策的执行，包括严格执行户籍制度、限制从农村雇佣工人、计划生育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然而，由于总人口在增长，在那段时间里，城市人口仍然从1.16亿增加到1.72亿。⁴⁷

1961至1963年2,600万人“下放”之后，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化了“上山下乡”运动。学术界仍然在讨论这场运动究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还是为了减轻国家提供教育、就业、住房和粮食供应的负担等经济原因。“按照宣传上的说法，知青可以帮助农村

和边远地区发展，同时他们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进的高潮时期，人们称这个运动是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途径。知育“下乡”也是遣散难以控制的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的有效方式，1966至1967年政府曾对这些组织失去了控制。在这本书中，我将主要讨论这场运动对粮食问题的影响。

很多“下乡”的城市青年以前从来不知道农村这么贫困，这些情况让他们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们希望回到城市、逃避艰苦的生活。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让他们没办法获得批准离开农村。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的1,600万知青，有800万随后得以离开农村去上大学、参军或回城工作，其他人在毛泽东去世后才返回城市。⁴⁹

有意思的是，三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天津和上海，下乡知青也最多。⁵⁰在饥荒期间，这三个城市和其增长的人口都是依靠农村提供的粮食，现在几百万城市青年失去了“铁饭碗”。共产党当时没有公开承认，1,600万知青下乡与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有关，但提到了城市为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提供就业的困难。⁵¹1950年代，国家希望知青在农村可以参加农业生产，粮食自给。⁵²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知青不会做农活，但同时需要住房和田地。政府需要给他们发安置费，包括住房、医疗、交通、学习用具和农用工具。1967至1972年间，中央政府为这些项目支付了17亿至18亿元人民币，但补助仍然太低，不能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⁵³知青在农村的收入常常比当地人低得多，因为农民可以通过其他的经济活动获得额外收入，而且有好得多的自留地。很多知青的父母都要支援在农村的孩子，定期给他们寄钱。粮食欠收时，当地干部总要尽可能地降低知青的口粮标准。⁵⁴大部分农民认为知青对生产队是一个负担。

由于农村的冲突和知青抗议事件不断增加，1973年中央政府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问题工作会议，决定提高给予知青的补助。另外，如果知青的口粮低于未婚青年的一般水平，或者一个生产队口粮标准过低，知青可以从国家商品粮中得到额外的补贴。根据《中国知青史》一书的说法，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农民对下乡知青的态度改变了，因为政府给予更高的补贴减轻了农村的负担。⁵⁵知青不是与农民在一个生产队劳动，而是组成自己单

独的生产队。而且，政府指示农村给知青同样质量的自留地。⁵⁶前面谈到，国家要为“下乡”项目拨款，还要将国家的商品粮部分用于补贴知青。尽管如此，1962至1979年还是有1,776万城市知青下乡到农村。因为，政府不再需要给他们提供每天508到900克的全额城市粮食定量。毫不奇怪，《当代中国粮食工作》承认“下放”有助于减缓城市人口的增长，有助于稳定粮食供应系统，同时有助于国家的收支平衡。⁵⁷比如，上海城市和郊区粮食供应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相对稳定，因为“下乡”减少了人口。⁵⁸总之，上山下乡运动为国家节省了粮食。但是，节省的幅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同时又需要比原计划招聘更多的农民到工厂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反城市化的政策，但是认定根本没有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是错误的。城镇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增加了2,700万，其中1400万来自农村，这给粮食供应体系造成了很重的负担。⁵⁹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产量总体上增加了，但是1971和1977年粮食产量下降时，中国还是遇到了粮食供应危机和食品短缺。1971年，周恩来负责粮食供应，他警告说，工人数量增加了，国家发的工资也增加了。1971和1972年，工人增加了980万，至少500万是超出计划的。⁶⁰为了给这部分人供应粮食，必须使用粮食库存。1972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一份“粮食问题报告”，要求减少城市人口和工人数量。因此，1973至1976年，享受粮食定量供应的城镇人口年增加量减为200万，而此前1971至1972年是平均每年增加400万至500万。⁶¹1977年发生供应危机时，政府的反应是相同的，即强调必须严格控制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所谓的“黑户口”（即非法城市居民）必须送回农村。⁶²接下来的几年里，返城知青给城镇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寻找平衡

与大跃进时的做法相反，1960年代，中国政府努力在各省之间进行平衡，并进行粮食调运。北方的很多省需要依赖从南方运来粮食。1971至1976年间，以前粮食富裕的省份，

如四川、内蒙、贵州和新疆变成了无余粮省，而这些省以前都曾是向灾区提供粮食的重要地区。北京、天津和上海依靠进口大豆来平衡短缺。1975年，四川省党委书记李井泉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在大跃进期间，他曾愿意为国家的粮食供应牺牲四川的几万农民。他在信中称，如果政府不关注这个问题，1959年的错误会再现。中央政府的反应是减少在四川的征购，并在第二年向四川运送了50万吨粮食。⁶³尽管声称要自力更生，中国政府继续进口粮食。从1967到1976年，中国每年平均净进口211万吨粮食，在饥荒之后的1961到1966年每年进口为418万吨，1977到1984年为每年1,045万吨。⁶⁴1950年代的以出口农产品来资助进口工业品的体制在饥荒期间崩溃了，因为不可能为此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

由于苏联的战争威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了粮食储存的新政策。毛泽东发动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运动，鼓励地方当局和农民建立地方粮仓，甚至在家里储存粮食。分散的人民战争战略要求组织更多的地方储备，北方对南方粮食的依赖被视为严重的问题。

⁶⁵虽然没有提及大跃进，但认为人民公社时比1959年能更好地应对饥荒。1975年的新宪法提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并且允许农民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拥有自留地和自留畜（第7条）。⁶⁶

改革后的资料表明，没有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的情况会好得多。这可能是对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粮食产量高于1950年代初期，也高于调整时期（1962-1965），这个时期在官方历史中常常被称作“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口统计表明没有大量的死亡，这个数字是有没有发生严重饥荒的标识。⁶⁷但是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供应存在问题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不断开展教育民众节约粮食的运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多次呼吁百姓节约粮食，代以食用蔬菜、豆类、土豆、燕麦和胡萝卜。⁶⁸1972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减少了965万吨（见表8.1）。为了减少消费、保障灾区农民的口粮，1973年商业部粮食办公室为所有各省制定了农民口粮的最低线。在很多省，口粮低于每天500克。比如，陕西和山西省为一天356克，河南省最高为575克。⁶⁹可以设想，每天低于400克口粮的灾民要挨饿。与大跃进期间（1959-1960）粮

食产量两年快速下降的情况相反，197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收成最好的年头，接下来的两年里粮食生产也有了改善。

在毛泽东时代，严重的饥荒没有再发生，但是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很多地区仍然司空见惯。197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承认，1977年“农村超过一亿人缺粮”。⁷⁰对1970年代的饥饿问题研究很少。⁷¹中国新闻社两位记者所写的报告讲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农村饥饿情况的故事十分动人。⁷²但是1970年代末饥饿和贫穷的原因与大跃进时期的大不相同。第一个报告讲的是黄土高原上发生的事，强调与不负责任的政策相关的环境问题。⁷³陈大斌写的第二个报告谈到农民没有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因为受“四人帮”支持的地方干部执行左的政策，不鼓励提高生产。这些故事结束时常常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穷的生产队靠救助、粮食贷款和国家的返销粮。⁷⁴这些农民不是像大跃进期间那样受到国家的剥削，但他们因生产力的低下而生活在贫困之中。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曾指出，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返销粮在中国的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⁷⁵据估计，到1970年代末，大约有20%的生产队难以维持，成了国家的负担。这个体制主要依赖20%最好的生产队所生产的剩余粮食。⁷⁶

1978年，中国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设定的每人每天不低于2,400卡路里的基本营养标准。⁷⁷尽管改革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有了改善，供应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那段时间里，邓小平领导的新领导班子决定执行：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即“独生子女”政策，要求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法，进行严厉的控制。党的领导人认为，只有通过计划生育将人口增长减缓下来才能实现宏大的新经济目标。⁷⁸在1978年，中央政府在给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用粮食问题作为理由解释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快速的人口增长使国家为所有人提供粮食、服装、住房、交通、教育、卫生保障和就业愈来愈困难。人均粮食消费，包括工业和其他需要，一年至少800斤。“如果新生儿达到一亿，我们就得生产8,000亿斤（400万吨）粮食。目前我们国家人均可耕地只有两亩。如果人口增加三亿，人均可耕地就会减少到一亩多一点。根

据目前的形势和土地减少的情况,生产人均 800 斤粮食和足够的经济作物相常困难。”⁷⁹1980 年代初期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⁸⁰随着经济的高涨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人口增长会危及粮食供应的说法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且肉类和蔬菜成了饮食的重要部分。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认为计划生育是解决粮食问题、避免饥荒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民主与饥荒

让·德勒兹和亚玛特亚·森认为,民主和新闻自由是防止饥荒发生的关键因素。他们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饥荒。德勒兹和森指出印度 1947 年独立之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荒。他们观察到,在印度民主制度和自由新闻媒体的监督下,政府要对饥荒的威胁立即作出反应。这是印度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印度在经济增长、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之后都落后于中国。他们对发生大跃进饥荒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和新闻自由,信息误传和政府对于危机的误读导致对农村粮食征购的急剧增加。⁸¹“没有对立的政治势力和新闻媒体还意味着,政府没有来自反对派和了解情况的公众舆论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去迅速采取反饥荒措施。”⁸²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甚至认为毛泽东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承认了饥荒的发生是由于“缺乏更加民主的体制在中国所遭遇的这类灾荒中可以提供的信息。”⁸³毛泽东确实说过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以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但他的讲话里没有直接提到饥荒。⁸⁴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主席谈到从灾荒中吸取教训。在现有体制中改善信息流通在结束饥荒的改革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绝对不是结束饥荒的主要政策。

德勒兹和森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避免严重的饥荒,但是对广泛的营养不良却束手无策。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虽然中国仍然是一党统治,但中国共产党在 1949 至 1958 年间以及 1962 年直至今天成功地避免了严重的饥荒呢?如果新闻自由是避免严重饥荒的关键,为什么在

“耻辱的年代”之后没发生严重的饥荒？这些问题在只有民主与专制这样两个问题的框架内不可能找到答案。在后来的专著中，德勒兹和森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承诺问题。“由于曾作出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激进承诺，中国确实实现了很多印度领导人未能奋力争取到的目标，这个承诺是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与理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消除饥饿、文盲和改善卫生状况完全属这个承诺的内容。如果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方向正确，结果可以十分明显，如改革前的社会成就所显示的。”⁸⁵考虑到政治承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消除贫困方面的重要性和份量，在苏联和中国怎么会发生饥荒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注意。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既可以创造卓越的成就，也可以制造灾难。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和新闻自由有助于避免严重的饥荒，我们同时也看到，不民主的社会，如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和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可以成功地避免严重的饥荒。⁸⁶德勒兹和森对民主的关注没有考虑到其他思想意识和机制也可能在如何应对饥荒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儒家思想和中华帝国的国家救灾系统。⁸⁷我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在1947和1961年之后有避免饥荒的决心。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再发生饥荒，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形成挑战。而且党的领导人不想改变农民的现状。德勒兹和森关于仅仅是粮食增产不能结束饥荒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得考虑获得粮食的权利问题。在苏联，原城市人口所拥有的定量供应权扩大到了农村。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通过进口粮食来避免与农民的进一步冲突。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统计系统总是有可信性问题，但是如饥荒期间所发生的农民口粮信息完全缺失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民主和新闻自由可以为避免饥荒提供更好的条件，但苏联和中国的例子表明，这些并不是避免饥荒的必要条件。此外，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在避免饥荒方面的成功帮助，将饥荒的发生归咎于缺乏民主过于简单化。

即便退一步说，苏联和中国没有得瓦尔和塔克斯顿所说的那种应对饥荒的官民一致的安排，不容置疑的是，共产党从饥荒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在后来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成功地防止了饥荒的发生。苏联政府自1960年代之后为营养水平的迅速提高付出了高昂

的代价。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农业补贴和农村福利成为国家巨大的负担，像苏联那样由国家资助的全民福利和养老机制至今在中国农村还没有建立。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那样补贴农业。尽管与1950年代相比粮食征购和税收都比较轻，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强调自力更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混乱时期，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系统没有崩溃。但是，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二元社会”的留存。由于担心饥荒的爆发，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和社会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城市化停止了二十年，因为领导人担心80%的农民养不活超过20%的城镇居民。除此之外，我还认为，1963年开始在城市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减轻农民负担。直到19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的理由是担心中国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告别了物质贫乏的时代。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取消了不得人心的强制性粮食分配制度，但在中国与其类似的统购统销制度一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不同再次表明，中国的资源要紧缺得多，中国领导人在三十多年里都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的粮食问题。森所强调的民主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没有太多的适用性。如果政治领导人有这样的意愿，一党专制的国家也可以避免饥荒的发生。■

结 论

饥饿与社会主义

当共产党在苏联和中国开始执政时，他们继承了一个巨大的负担。中国是一个“饥荒之国”，在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和1950年代初都有大量百姓饿死。中国那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¹在沙俄时代后期，虽然俄国农业比中国发达，农村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1891年的饥荒中还是饿死了5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促使了沙皇政权和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的垮台以及俄国军队的崩溃。中国和苏联政府启动了野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规划，希望以此改变他们国家的落后面貌，但是新政权刚建立的一二十年里就

发生了比过去任何政权当政时期都要多的严重饥荒。1950年代初，中国北方贫穷省份的农村人所摄人的卡路里在当今看来已经是饥荒的水平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粮食的购销在国家指导下统一进行，因此在苏联和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如果计划出了重大的误差，就会造成不仅是牙膏和肉类等物品供应的问题，而是会出现极为严重的饥荒。

西方学术界常常把大跃进简化为高层的派系斗争或者农村党组织和农民的冲突。一些学者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长期贫穷和饥饿的历史，他们容易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饥荒归咎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残酷或错误的决定。杰斯帕·贝克、拉夫·塔克斯顿和高王凌这样的学者对饥荒期间农民与干部的冲突做了重要的研究。²不过他们认为向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灾区农民提供粮食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实际上，农民和国家并不是涉及饥荒问题唯一的因素。我认为，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以及粮食供应体系中包括城镇居民、部队和灾区农民等所有方面，才能对饥荒有更好的理解。

大跃进造成的饥荒

比较温和的农业政策给城市糙食供应带来问题，为了应对这个危机，斯大林 1929 年、毛泽东 1958 年发动了大跃进，目的是使他们的国家在短期内一举跨入现代化。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大跃进的战略充满风险。在本书中，我以事实表明，苏联 1931 至 1933 年的饥荒与中国 1959 至 1961 年的饥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这两个饥荒都与激进的集体化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有关连。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农村向城镇提供粮食供应增加了巨大的负担。两个国家在初期都没有建立可以处理千百万人遭遇饥荒的救灾系统。与其他饥荒如俄罗斯 1921 至 1922 年的饥荒不同，在这两个饥荒中，政府都能避免全国范围的流行病爆发，因此大部分死亡是饥饿而不是传染病造成的。³时间上的相似性也很惊人，两个灾难都发生于和平建设十年之后，以及推行了一两年激进的集体化之后。这些与苏联 1919-1921 年以及 1947 年的饥荒有重大的不同，后者发生在遭战争摧毁的背景下。

中苏两国共产党政府十分相信合理的计划 and 现代化的技术，他们低估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农业生产也会下降的情况。而实际上，对农业是没法像对拖拉机工厂那样进行计划的。在这两个国家，早期五年计划都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发展，仅仅从支出角度考虑粮食消费。共产党明确表示，仅仅从财富和资源的角度着手不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要强调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对苏联和中国领导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农民要为此作出“贡献”，他们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元社会”，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都进了工作单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养老和粮食定量，而农村人则要靠自己劳动的结果，只有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才能得到中央的帮助。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确定城乡粮食供应的比例。一方面，城市消费的所有粮食都来自农村，都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粮食征购比例太高使农民余下的粮食不够吃饱。另一方面，如果农民用粮增加，就无法养活城市居民。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政府就以城市工人和灾区农民的需要为由要求余粮区的农民减少口粮。同时，政府又用工农联盟等理由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共产党希望老百姓可以培养爱国情怀，将浪费看作“不爱国”的一种罪过。大跃进和急速的城市化，打破了农业生产与城乡消费之间脆弱的平衡。

在苏联，仅仅在供应危机和战争时期对粮食进行定量供应，但中国1953年至1980年代中期一直维持定量供应制度。限制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因为国家从来没有给农村人发过粮票。农村的口粮是根据农业收成和国家征购之后剩余的粮食来确定的。1949年新中国政府承诺不许饿死一个人。⁴但同时，中央政府又明确说，只有发生了影响到好几个省的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才能发送救济，所有影响地域较小的自然灾害都要依靠当地资源自己解决。中央政府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宏大的承诺，但没有足够的资源确保向所有灾民运送救济。实际情况是，1950年代中期，“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已经从报刊上消失了，1959年发生饥荒时，政府必须决定救援哪些群体、哪个地区，哪些人得挨饿。

饥饿的等级划分：防止城市发生饥荒

我认为，应该将饥荒看作国家与农民在余粮问题上全面冲突而导致的严重灾难。在这个冲突中，双方在饥荒发生前都假造统计数据。农民和地方干部瞒产，有时为了多得到救济多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而国家则根据虚报的产量，提高了粮食征购率。苏联 1920 年代末、中国 1957 年时，政治领导人对农村报告的饥饿情况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斯大林和毛泽东不只一次表示，他们相信农民在假喊饿，目的是破坏粮食征购，政府必须猜测农民真实的饥饿程度，我称这个现象为饥饿的政治化。

确实，中国经历了严重的供应危机——1953、1954 和 1957 年，但危机没有演变为全国性的饥荒。因此可以理解，当饥荒于 1959 年初爆发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整个国家受到了饥荒的威胁，农民不再是假喊饿了。

确定到底多少粮食定量够吃，这个问题本身就会引起冲突。早在饥荒发生前的 1955 年，在为农村设定统一的口粮定量时，国家就已经在定量上作了不利于农村人的等级划分。⁵ 在小麦生产区，一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天的定量是 750 到 900 克粮食，而农民的口粮标准从来没有明确过。国家领导人如陈云建议，一个农民一天合理的口粮为 500 克细粮（大约 1,700-1,830 卡路里），但这类建议并不意味着农民有权得到任何口粮。⁶ 有没有权利获得口粮也按地理区域作了划分。中央政府负责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粮食供应。早在 1958 年冬季，李先念就说，如果其他省饿死人，各省政府要承担责任。⁷ 中央政府在后来的饥荒中所做的决定反应了他们确定的优先顺序。比如，中央政府决定将农村口粮大幅度降低、1959 年和 1960 年上半年发动食用粮食代用品的运动“瓜菜代”。而城市粮食定量仅作了很小的下行调整。政府不是结束大跃进政策，而是从所谓的“余粮”省调入粮食。在苏联，政府将城市分类，A 类城市完全由中央调配粮食，B 类城市要配以地方上征购的粮食，C 类城市则完全没有中央的粮食调配。⁸

在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确定优先级，决定先让谁有饭吃。我前面已经谈到，中国政府没有完全忽略农村的饥荒，他们采取了措施。1960年上半年，国家机器被动员起来防止农村饥荒蔓延到城市。政府甚至从已经挨饿的农村征购更多的粮食，后来城市的粮仓几乎空了。直到那会儿，中央政府才愿意改变政策，并开始进口粮食。

如果我们对比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它们都有这样的优先次序：

1. 党的领导层和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工人。
2. 部队。两个国家的军人都受到保护，享有不会让人饿死的定货。
3. 重要城市如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地区。
4. 出口。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和用粮食换取工业技术，它们继续出口。
5. 在苏联农村，机械站、拖拉机站和一些地方工厂的工人也分到粮票。在中国，一些建筑和水利项目的临时工以及国营农场的工人享有播食定量。
6. 普通农民。
7. 劳改营的劳改犯。⁹

除了劳改犯，农民是最不受重视的群体。排在前面的几组人远可以分到大米和白面，那都是高级粮食，而贫困省份的农民只能吃红薯。在大跃进期间，农村与干部有关系的农民或公共食堂工作人员活下来的机会比其他人大一些。在苏联和中国，传统缺粮区有时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国家不会强行征购，大家都知道这些地区甚么也收不上来。有些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俄罗斯帝国传统的粮仓乌克兰竟然在1931至1933年的饥荒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打击。但是，我觉得根据苏联政府为防止城市发生饥荒从余粮区征购更多粮食的逻辑，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很好理解的。

亚玛特亚·森认为，在有些饥荒中，人们不是因为粮食不够而饿死，而是因为没有分到粮食的权利。¹⁰“权利”问题更多关注粮食的分配而不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也是对将饥荒与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新马尔萨斯理论的一种批评。根据森的观点，可以说，苏联和中

国农民饿死 是因为他们无权得到粮票，国家分配粮食的方式对农民极为不利。然而，这两个国家当时粮食产量都减少了 30%，¹¹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大都是重要的因素。1931 至 1932 年苏联享受城市定量供应的人口增加了近 800 万。中国 1958 至 1960 年城市人口增加了 1,950 多万。¹²两个国家的供应体系都无法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给如此多的人供应粮食，但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毫无疑问，两国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将全民纳入供应体系。我认为，缩小过于宏大的大跃进计划比扩大供应体系更加现实。

此外，粮食出口给供应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果两国政府早一些停止出口，千百万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挽救。我做了一个估计，对苏联来说：按每人每天 600 克粮食定量计算，仅 1932 至 1933 年的出口就足够养活 820 万人一年。这个数字大于一次饥荒所损失的人。对中国来说，按每人每天 500 克粮食算，1960 年的出口足够养活 540 万人一年。这个数字比 1960 年饿死人的数字低很多。但是如果政府 1959 年就停止出口，则可以挽救另外 2,590 万人的生命。这只是纯粹的设想，因为它的基础是政府对哪儿需要救济了如指掌，而且粮食分配中不出现任何损失、被盗和浪费的情况，而现实中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不过这个估计 表明，出口确实是理解饥荒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令人吃惊的是，在为了城市的稳定和工业化牺牲了千百万农民的生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如出一辙。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源于城市，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有很强的根基，因为他们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但发生危机时，政府相信城市的稳定是保证政权生存的关键。保卫城市可能是共产党能够从饥荒中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人和士兵没有像 1921 年王冠城起义时那样，将枪口转向布尔什维克。边远地区的分裂活动也没有造成秩序的崩溃，没有与中部地区的起义相呼应。

对于宣称目标的实现，斯大林似乎比毛泽东更成功。斯大林的整个任期里，粮食征购系统都能够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出口虽然比 1930 年代初要少得多，但仍然可以继续。城市化得以在集体化框架内和饥荒的背景下保持较高的水平。与苏联的情况相比，中国剥削农民的体制不得不在 1962 年予以“调整”。很多年里工业技术不能以出食来换取，而是必须

在国际资本市场采购。1958至1960年的快速城市化必须予以纠正，1961至1963年2,600万人被精简到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停止了二十年。相对于斯大林来说，我们可以为毛泽东辩护说，在他的统治下没有发生第二次饥荒。但这是不是说他没有斯大林那么残忍？或者说只是因为他觉得再来一次饥荒会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

社会主义需要饥荒吗？

集体化并不必然产生饥荒，但是苏联1929至1931年和中国1958年在落后的条件下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实施集体化导致了千百万人饿死。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曾经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吸取经验教训：激进的社会变革会导致城市供应体系的严重危机。他担心革命派会转而将矛头对准农村，把农民推到了反革命的怀抱中。¹³他的警告被忽略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饥荒有助于粉碎农民对全面集体化和粮食征购的抵抗，更有甚的是认为饥荒是斯大林有意为之。¹⁴很多其他学者则认为，苏联和中国政府没有故意制造饥荒。饥荒有悖于政府的计划和愿望，饥荒的发生有着大规模粮食欠缺的背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饥荒有没有帮助政府强化了新的集体化秩序。

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几年内完成的。资产阶级势力很弱，城市大量的工人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个改造给工人带来了福利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对新政权真正的挑战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布哈林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认为减缓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是比开展大跃进更胜一筹的战略。前面已经谈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出于政治原因更加青睐于激进的方式。在苏联，自愿而渐进的合作化运动在农村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农民都不愿加入。而且在斯大林看来，1928年的粮食危机和城市对粮食供应的不满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打败“富农”和“破坏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950年代初期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摧毁了传统乡村精英，因此中国的合作化比苏联少些暴力。但是1957年毛泽东不满意新秩序运动的结果，他想以

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式再前进一步。落后被看做良好的起点，因为政府感觉到，如果农村人收入增加了，取消私有财产所有权会更加困难。1958年秋季，党的领导人感到可以将中国改造为工业化国家，在短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要不断地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因为无法知道权力的平衡什么时候转向不利于社会主义，所以要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

饥荒实际上破坏了农民进行公开对抗的能力。1930年代苏联农村发生过很多起义，1933年以后被打垮的农民无力以公开反抗的形式挑战新的制度。多纳德·费尔泽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苏联1947年的饥荒摧毁了一切关于战胜纳粹可以放松对工人农民控制和剥削的希望。¹⁵ 所以饥荒有助于重建斯大林式的秩序。1956和1957年几百万农民退出了合作社，而且尽全力把粮食留在自己手里。1957年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粉碎农民的抵抗。甚至在饥荒未使农村陷入混乱之前，这场运动已经成功地阻止了对农业合作化的背离。

我此前已谈到，在苏联和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从饥荒中学到如何调整与农民的关系。通过饥荒，政府了解到，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接受混合所有制，包括私人拥有自留地。政府知道，粮食征购和税收必须限制在既能让国家继续工业化，同时也能让农民生存的水平上。在对农民作出这个让步之后，国家得以保留农业集体化。从饥荒中产生的新集体农庄制度和新人民公社相对稳定，在苏联存在了40年，在中国则为20年。1961年赫鲁晓夫承诺这一代人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看到共产主义，他试图对农民的自留份地加以限制。这些激进的政策都很短命。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后，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新政府最终与农民就自留份地问题取得了和解，自留份地生产大量的土豆、蔬菜、肉类、牛奶和羊毛。在苏联，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接任党的主席并挑战1933年饥荒后建立的体制，这个体制才改变。¹⁶ 此外，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在经历了严重的饥荒后才能进行改革。没有灾难的发生，很难让他们质疑“总路线”并且承认错误。在中国和苏联，大跃进政策是与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问题演变成全国范围的饥荒时，斯大林和毛泽东才愿意开始新政以结束苦难。我们可以说，至少在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

制度需要经受了饥荒的教训，才能在农村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

不过饥荒对执政党来说也有很多坏的影响。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曾保证要结束饥饿和贫困。饥荒的发生对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饥荒对饲养牲畜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农民杀掉了牲畜，吃掉了种子粮和饲料。陈云称这种现象为人畜争粮。¹⁷ 国家保留了农业集体化，但是其运转完全依赖农民参加生产的情况。农民的选择是保持较低的生产率，因为农民在集体制农业生产中没有积极性。

然而，饥荒没有摧毁人们所有的希望。在中国，国家被迫进口粮食供应城市居民，并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对救灾给予更多的关注。¹⁸ 地方干部和农民也知道了，他们的生存不能依赖国家，所以他们使用各种战略如瞒产，把更多的粮食留下来。¹⁹ 国家不得不对剥削农民设置限定。中国领导人从饥荒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户口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因为不可能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 20%的情况下，依靠农村为城市提供粮食。1962 年城乡关系作了全面调整。随着 2,600 万人“下放”到农村，国家解除了为这些人供应粮食，以及为此从农村征购粮食的义务。由于重要城市的供应采用进口粮，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我曾表明，1961 和 1962 年时，这些政策比提高粮食产量对结束饥荒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下乡”也是减轻城市粮食供应的一个方式。1963 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是饥荒中学到的另一课。政府意识到，人口的增长 应该与粮食生产协调。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鼓励青年造反，但同时也避免了城乡经济的崩溃。

在苏联，斯大林死后，为发展重工业残酷剥削农民的体制结束了。战后苏联农村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党的领导因此意识到必须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赫鲁晓夫时期取消了从农民手中强制征购粮食的做法和对农民异地就业的限制，福利制度扩大到农村，农民可以享受养老金、一个月的假期、固定工资和带薪产假。愈来愈多地从美国进口粮食，而不是进一步地剥削农民。1931 年出口 560 万吨粮食，1973 年则进口 9,920 吨粮食。²⁰ 这个数字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农业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的证明，也可以看作是农民对国家的胜利。进口粮食主要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和牲畜，也极大地减轻了农民供应城市的负担。在

苏联，农民从被挤的“奶牛”变成了社会转型的获益者。总之，在艰苦和被迫做出牺牲的历史时期之后，国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消费者的需求都予以关注。在饥荒结束后，国家得为以前的信念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信念就是农民应该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牺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城市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苏联共产党在1960年代就将福利制度扩大到农村，而中国共产党直到最近才为此做出认真的努力。²¹原因可能是苏联比中国更发达，以及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1970年时苏联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苏联在取消了对农民迁徙的限制后，面临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压力。而中国1962至1980年代初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因此农民缺乏“逃离的办法”，国家在提高农村生活水平上压力不大。

我认为，国家和老百姓之间没有就避免饥荒作出安排，因为共产党不允许讨论饥荒，也不允许公开追悼千百万饿死的魂灵。但苏联1947年之后、中国1962年之后没有发生严重的饥荒。最后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一辈子经历了几次饥荒的农民来说，不再有饥荒是确实是个成就。在中国，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饿死，而1962年之后不再有饥荒，这确实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大的成就。

德勒兹和森认为印度因其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在1949年独立后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饥荒。²²苏联1947年之后和中国1962年之后的例子说明，一党专制也可以避免饥荒，如果其政府有调整城乡关系、改善体制内信息流通状况的意愿。民选政府确实有更大的压力避免饥荒，但缺乏民主并不是苏联和中国发生灾难的原因。不过尽管没有发生严重的饥荒，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贫困省份饥饿和日常生活品不足的现象直到1980年代初启动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到户）之后才消失。在苏联，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现过细粮供应问题，但是即使在1963年粮食严重欠收之后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左雷斯·梅德韦杰夫认为，如果苏联没有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的粮食，城市居民1970年代末日常食品消费情况会比1920年代还要差。²³苏联政府不得不为保持城市的社会平稳付出高昂的代价。

饥荒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

我认为，饥荒严重地影响了农民融入社会主义体制。在欧洲，民族形成和将“农民变成公民”（比如说变成“法兰西公民”）的进程在18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帝国，国家和农民之间依然有很大的隔阂。²⁴对皇帝的忠诚将中原和边远地区凝聚在一起，但国家权力在地方上没有很强的根基，地方由当地的精英控制。

在欧洲，建立大型的现代化军队对于将农村人纳入民族构成十分关键，后来国家福利制度涵盖面的扩大对公民意识的形成也很重要。有些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的农民还没有转变成俄罗斯公民。当来自农村的士兵把枪口转向政府时，帝国的军队崩溃了。布尔什维克想用土地改革赢得农民对革命的支持。新政权得以从内战和1921至1922年的饥荒中存活下来，但是不得不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家与农村社会的隔阂仍然很严重。萨尼说：“新经济政策让国家与农民进入一种停战状态，它使农村和粮食主要掌控在农民手中。”²⁵1929年的农业集体化使新获生命力的农村公社免于崩溃。在后来的饥荒中，农民很快知道，国家不能或者不愿保证他们的生存。尽管苏联1936年宪法消除了阶级歧视，但农民在饥荒中得到了血的教训：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公民。

在中国民国前各朝代，县以下没有国家机构。魏格林和一些其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存在隔阂。²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几乎每一个村子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但是公社以下的干部不拿国家工资，他们的工资由地方支付，这样可以节约中央预算。农业集体化可以看作国家强力渗入农村社会的一个过程。1953年，政府决定，只有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才能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危机。随农业集体化，农民一步步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中。1957年报刊报道了农村的抱怨：城镇居民享有福利、工作有保障、有医疗卫生保障，而农村却要养活不断扩大的城市。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政府向农民提出了“新办法”，提出将“铁饭碗”扩大到农村。²⁷公共大食堂能保证让所有人都吃饱，还办了幼儿园和养老院。除了人民解放军之外，还提出了“全民皆兵”，即在农村建立民兵队伍的

计划。由于发生了饥荒，建立农村福利制度和民兵队伍的计划都落空了。饥荒之后，比较温和版的人民公社加强了地方干部和村干部的权力，因为国家意识到，必须承认集体与家庭的“自然边界”。其结果是，1962年之后国家不能像大跃进期间那样干预农村的生活了。户口制度强迫农民呆在农村，因此保持了家庭的纽带与农村社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一部分城市民众积极参加了运动。农民得先考虑吃饭问题，他们的革命精神差不多都丧失了。

我们可以说，饥荒打乱了农民和平融入社会主义体制的进程。在苏联，德国1941年的入侵再次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斯大林为保卫“神圣的俄罗斯领土”而参战。德国有组织的饥饿政策和大规模屠杀使大批的苏联公民不会与侵略者联合起来对付苏联政府。粮食征购系统可以为赢得战争提供足够的资源。1930年代经历的很多艰难困苦都可以说是为了从法西斯侵略下解放欧洲。但是1947年的饥荒表明，农民的福祉仍然不是斯大林的优先考虑。1960年代苏联的福利制度扩大至农村，将农民纳入苏联社会的进程得以再续。这时农民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与工人法律上的平等。²⁸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仅有过有限的边境战。朝鲜战争(1950-1953)和越南战争(1979)中都有很大的伤亡，但是中国没有像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经历过国家与民众紧张关系的考验。

边远地区的饥荒，民族政策和非官方记忆

大跃进饥荒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政府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如在乌克兰和西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从沙俄和清王朝继承了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他们都感到必须赢得非俄罗斯和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在取得政权后第一个十年里，他们推动少数民族的“民族化”政策和“优惠政策”。但是饥荒打断了这个和平融入的进程。对牲畜的集体化使他们在哈萨克、中亚及安多和康的藏区与牧民产生了暴力的冲突。1931年，斯大林得出结论：乌克兰的“民族共产党”要破坏粮食征购，因此发动了血腥的“大清洗”。

²⁹在中国，集体化和饥荒导致了1958年青海省藏区的起义。³⁰当动乱蔓延至西藏并最终造成1959年3月的起义时，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周围的藏族贵族与共产党形成的联盟瓦解了。饥荒之后，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更加中央集权，“民族化”的极盛时期最终结束了。我认为，饥荒打断了乌克兰和西藏和平融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饥荒和恐怖的经历造成了长时期的不信任。

两藏流亡政府和在美国及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团体利用饥饿的经历创建民族化的反叙事。我认为，这种将其纳入粮食政策的做法创造了特有的含义。由于乌克兰和西藏人的叙述十分相似，我将其选为边远地区饥荒问题的案例。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报告称，汉人1951年占领之前，西藏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在逃离中国的流亡藏人的叙述中，饥饿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们用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区别藏人和汉人，饥饿被描述成汉人剥削藏人的直接后果。在乌克兰的案例中，侨民中的学者形成了一种说法，即斯大林有意组织了饥荒，目的是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1991年乌克兰从苏联独立之后，“饥饿大屠杀”(Holodomor)成为乌克兰新的民族史学的核心内容。在爱尔兰1842至1848年的土豆饥荒中，民族主义曾经有过这样的观点，即英国占领者为了打击爱尔兰民族而有意组织了饥荒，而且爱尔兰人被迫食用饥荒食物，受到侮辱。只有独立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在西藏和乌克兰的例子中，在外侨民维系着这样的记忆。这样的集体记忆被用来勾划一个遭难的民族，它甚至把边界之外的人也包括进来。

而实际上，饥荒对区别不同种族并不是有用的议题，因为饥荒时，人们相互争抢，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偷盗食物，弱肉强食。为了帮助苏联和中国的饥荒是有意制造的，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藏族与汉族人之间划出一道种族区别线。他们以此将村子里的争斗外部化，把问题推给“外来的占领者”。这样撰写的民族历史建构了一个以受害身份或“集体创伤”为基础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乌克兰，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话语可以建立在农民苦难叙述的基础上。“饥饿大屠杀”的说法有助于克服社会分界，因此对于建立民族身份十分重要。在乌克兰，政府在首都建立了受难者纪念馆，在很多乡村，老百姓

也建起了墓碑或十字架追悼饿死的亲人。³¹通过使用“种族灭绝”、“饥饿大屠杀”这样的词，乌克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可以将他们的指责与国际法和全球性记忆联系起来，从而在西方社会获得支持。可以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维克多·尤先科总统领导下的乌克兰政府所进行的宣传相当成功。

为了反击西藏流亡政府指责汉人占领带来了藏族人的饥饿与不幸，中国官方历史学家发展了一套关于解放西藏的叙事。中国关于当代西藏历史的主要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即使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他们说，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新长征中，宁可“抓地鼠充饥”，也不愿给当地藏族同胞增加负担。他们指控1950年代初藏政府的一些人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解放军，对解放军发动饥饿攻势。阶级斗争的说法依然占主要地位。流亡藏人称粮食都拿去供应解放军了，而中国的说法则是，1959年叛乱之后，调整税收和粮食进口避免了饥荒的发生。他们还说，打破传统神权体制和僧侣的统治，把藏族农民从沉重的负担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不再需要供养庞大的僧侣群体，虽然中国关于饥荒出版过很多专著，但西藏1960年代的粮食供应问题仍然是一个秘密。西藏问题太敏感，人们无法对1961年之后西藏自治区是否受到饥荒的影响进行研究。西藏的冲突现在仍在继续，这说明宣传和经济援助都不能让大部分藏族人把自己当作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最终：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失败

本书表明，饥荒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发展。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为大多数老百姓提供足够的粮食。为此，苏联1929年，中国1955年建立了按等级划分的歧视农民的供应制度。雄心勃勃的大跃进战略旨在消除贫困和落后，其结果却是，以农村为代价向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出口粮食以换取工业品，以及为应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建立粮仓使国家不堪重负。国家与农民在剩余粮食问题上长期的冲突

造成了饥饿问题的政治化，合理口粮的定义成为争议的一部分。党的领导总觉得农民在假喊饿，目的是破坏粮食征购。由于对农民长期的不信任，政府低估或者甚至忽视了饥荒和老百姓苦难的严重程度。

饥荒期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体制方面，至少在粮食政策上相常理性，但是并不明智。由于阻止了农村的饥荒转化为城市的严重饥荒和动乱，政府能够保证重要地以至全国的稳定。他们似乎不认为千百万农民的死亡会革命政权合法性形成大的威胁。原因可能是，布尔什维克总是能挺过残酷的国内战争和此后的饥荒。我们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饥荒了解多少，但是对他们来说很明显的是，斯大林的统治能够延续二十多年，度过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流放、“大清洗”和战争。然而大跃进的战略使经济体制远远超越了界限。当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和农村的饥荒威胁到了工业发展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时，斯大林和毛泽东不得不对农民作出重大让步。苏联和中国的饥荒可能迫使农民被纳入国家经济。为了恢复粮食生产，国家不得不接受在农村实行混合经济所有制。饥荒后的社会秩序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世时没有改变。不同于苏联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和中国1956至1957年温和政策时期，中国在大跃进之后不可能取消已经对农民作出的让步。工业国有化和将城市工人纳入新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都比较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相对与这些成就来说，农村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迈进由于饥荒而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因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曾允诺消除饥饿，饥荒的发生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在农民心目中部分丧失。由于城市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村混合经济的矛盾，商品交换和货币不能取消。如同所预见的，农村转变的失败是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从长远来看不能成功、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革命不能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述诸章中的注释因为多系英文，本刊予以省略。如有需要者，请致函本刊）

附：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比较

第一章 粮食供应紧缺时期农民的“贡献”

第二章 保卫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中国饥饿问题的政治化

第三章 饥饿问题上的等级划分和农民与政府的关系（1949—1958）

第四章 为防止城市饥荒而让农民挨饿（1959—1962）

第三部分：边远地区的饥荒

第五章 帝国的负担：乌克兰和西藏的“民族化”

第六章 “为解放西藏抓地鼠充饥”：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的饥荒

第七章 “种族减绝”：西藏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叙事

第四部分：终章与结论

终章 经验教训：苏联和中国如何避免饥荒

结论 饥饿与社会主义

【序 跋】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 · 卷首语

何 方

一

很久以来，我就想对外交问题写点东西，叫笔记也好，叫随想也好，总之是想对中国外交和外交研究表达一些与官方和主流派不尽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为的是提供参考、引起讨论、听取批评。一直拖到今天，一来是离休后的十年先做了点别的事情，写了一部《党史笔记》和一部《自述》；二来是外交问题特别复杂和敏感，我又没有时间和条件翻阅大量材料进行研究，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可是回头一想，今年（2008年）已经年届86，如果再不动笔（因为我不会用电脑），以后就没机会了，因此决定先写起来再说。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部东西：既不可能全面系统，又不会提供什么新的资料，只是归纳了我自己对一些问题的不成熟看法。而且就是这样，能写多少，也还得视身体情况而定，因为终究岁月不饶人。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过去六十多年，无论从国内建设还是对外关系看，完全可以甚至必须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前期可称为毛泽东时期，后期已经被普遍定性为改革开放时期了。这两个时期的差别，用传统称呼，就是基本路线和总方针的不同。前期执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曾经造成许多严重后果，让人民吃了不少苦头，使中国社会停滞和倒退了三十年，成为世界潮流的落伍者。后期执行的可称为经济上开放的路线，虽然对前期路线有广泛的传承，特别是在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上，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作了些根本性的修正，因而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大体上能够适应世界潮流，融入国际社会，参

与全球化进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上层建筑虽无本质改变，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但经济却得到快速发展，对外关系也有了根本扭转，因而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这后期对前期不但有个传承关系，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个过渡阶段，也就是逐渐演变的过程。例如毛泽东时代并没有随着毛泽东去世而结束，后来执行的仍然是他的路线，还特别强调所谓“两个凡是”。直到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时才从根本上放弃了毛的路线，其标志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变化在外交上表现得比内政更加显著，但旧的烙印仍然长期残留。所以本书所谈对象为前期中国外交，有时也难免稍微涉及后期。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就跟张闻天进了外交部，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虽受撤职、降级、下放等处理，但总还算外交部一名工作人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离开，在外交部总共呆了整三十年。一半时间是躬身实践，一半时间也可说是近水楼台的研究，使我对共和国前期的外交多少了解一些。遗憾的是，由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我的所有工作笔记和本可由个人保存的材料如起草文件、报告的底稿等，都已被组织上收缴而不予发还。所以我对外交部的不多了解就只能靠个人记忆了。如果记不清楚或属道听途说的事，那就宁可弃之不用，也不勉强瞎凑。这是我历来坚持的原则，在写本书各篇时自然不会改变。这也是前面说过的，本书只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而不能提供什么新资料的缘故。

不过，稍可弥补的是，我从事国际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前后有50年。进外交部后，无论职务怎样变动，一直都是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离开外交部重新工作，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和原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也是直接间接为外交工作服务。离休后虽然改行着重学习中共党史，但对国际与外交问题的兴趣仍然未减，还继续作点研

究，并时而写点文章发表。这也是我现在敢于写这些东西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年来中国学界对外交问题的研究，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在共和国前期，可以说没有民间的外交问题研究，只有少数机关的内部研究。群众能看到的就是政府声明、报刊评论一类东西。我也曾从事过这一工作。记得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闹过一阵“开门办学”，北京大学请我给两个系讲中国外交政策。事后听到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老师们反映，连我讲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提法，他们竟然闻所未闻，可见前期外交之神秘。能够公开谈论外交问题和允许民间进行研究，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但仍一再重申对外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已经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时，一位研究人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含蓄地说朝鲜战争是北方发动的，结果朝方提出抗议，外交部通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转告其主管下的国研中心，以此人离开中心自谋工作才算完事。

外交问题研究真正拉开帷幕，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这也与苏联解体、俄罗斯当局大量公布对外关系档案有关。与此同时或稍后，中国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先后依法对过去的部分档案进行了定期解密。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推动中国前期外交的研究，催生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不但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材料，而且还发表了在这方面可谓数量空前的论著，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外交史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揭露了许多过去以保密为名而加以隐瞒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的正本清源。我能读到这一代学者的东西可能不多，但却受益匪浅。特别是沈志华和李静杰两位，还赠送给我已经译成中文的有关中苏关系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使我了解到许多事实真相和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我现在写前期外交问题，也可说是白髮人站在黑髮人肩上对过去的回顾。如有失误，那也是老眼昏花的缘故而不能赖别人。

四

关于共和国前期外交，想要谈的问题并不多，但涉及的面却很广，除个人的理解和记

忆外，还得使用不少材料。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规矩，一般都要开出参考书目和引文或依据的注释。对此，我想做一点改变。一是不列参考书目和资料，因为我觉得不太必要。说老实话，我先后读过的有关书籍、文章以至纯粹的材料也还真不能说少，但大多忘却了，因此列出来只能起壮胆的作用。例如马、恩、列、斯、毛，我大多数都读过，有些还读过多次，都列上，那是吹牛；只列其中若干卷，又没什么道理，所以还是免了的好。又如其他有关著作和文章资料，也确实读过不少，有的甚至看过好几遍。但是现在呢，读过的，多已忘却，或者记不准确；所记笔记，部分被收缴，大部自行销毁，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我写这部书，只是个人对一些问题的反思和随想，算不得学术著作，又何必装模作样呢？至于注释，总的原则是尽量从简，应当说明和需要指明出处的只在文中作点注，为众所周知和较为普遍和平常的问题，也就不多此一举了。

本书所用材料和进行立论的依据，除个人的一点平凡经历外，基本上都是公开材料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所以并无新意可言，更谈不上泄密。如果有人硬要说是泄密，那只能是欲加之罪。但是同样的材料，也可产生不同的结论和看法。甚至拥有材料最多和看得最细的人，对问题的看法却不一定对。因为比材料更重要的还是观点、方法和对材料的驾驭。这是一些西方先哲和中国学者早就论述过的。例如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称道过的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就比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和机械唯物论更接近真理。这倒不是有意为自己掌握材料不多预设辩词，而是想说明即使对某一问题拥有材料不多，也还是有些发言权的理由。例如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推行人民公社的主观原因而论，就存在多种说法。主流的说法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使全国人民早日摆脱贫困状态。对此辩护，我就不大信服。因为在明知“大跃进”、公共食堂行不通，并已出现饿死人现象，因而准备反“左”的情况下，却在庐山会议上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并且接着就在全党全国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无论从动机还是效果、或毛自己提倡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看，都完全推翻了这种主流舆论。另一种意见，说是为了振兴中华，一吐过去长期受美帝欺凌的满腔怒火。根据我的体会和了解，也根本不像，证之以不久后就坚持联美反苏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再

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毛内心是想把苏联比下去，为共运蹀出一条新路，生则争得国际共运领袖，死则名垂千古；同时要借此排除异己，进一步提高个人威望和加固独裁专制体制。这倒很有点像。可见，结论的正确与否并不和掌握材料的多少成正比。

五

既无什么新的资料，又不成系统（体系），写这部有关共和国前期外交问题的书，为何来？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只是出于以下几点想法。

一是希望对外交问题的拨乱反正起点推动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掀起了一阵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风，对国内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反思、检查和探讨。虽然由于很快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中途刹车，进行得并不彻底，但此风既起，就不容易完全压住。例如虽然一再三令五申，不许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三年困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但是谈论终究禁止不了，而且除了极个别的“四人帮”残渣余孽外，即使主流派舆论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为“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翻案平反。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有关外交问题却完全是另外的情况，并没有作过什么拨乱反正，反倒被认为一贯正确。毛泽东晚年把中国搞成了国际社会的孤儿，1982年中央关于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要说他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我就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并被作为一种需加注意的思想动向写进了会议《简报》，自然不会起任何作用。直到现在，官方和主流舆论，都绝不承认中国外交有过什么失误。连外交部发言人的对外谈话，不管提到什么问题，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或者“我们历来主张”等。看来，在外交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的补课，不但完全必要，而且大有裨益。这样做，既可以增进中国作为讲求实事求是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内也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去掉或减少愚民政策的造假藏真，必定会获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是希望给外交研究这个长期的禁区打开一条缝。给外交研究和讨论设禁区，那是专制独裁的需要。因为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监督和批评，有利于“坐江山”的稳固，但

对国家和人民却危害极大。在国际上也是瞒天过海，不敢负责的表现。例如从过去到现在，对外援助除少数例外，基本保密，大概就是担心老百姓不满和闹事。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国内饿死人无数，不得不进口一点粮食。有一次从加拿大购进几万吨小麦，载粮船只已开到回国的海洋路上，但阿尔巴尼亚要求供给粮食，于是一声号令，运粮船向阿驶去。你说这事让老百姓知道能高兴吗？又如现在，连在政府无任何兼职的某些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可在访问中亚和非洲时向一些国家撒钱援助（因对国内秘而不宣，只能从外电报道中了解到一点），但却从未见到他们去宁夏、青海、云南、贵州等国内许多贫困地区探望尚未实现温饱的群众，更不用说支援和布施了。要知道，用于援外的是纳税人的钱，怎么能背着他们去花呢？还有，由于以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和某些后继者，不懂和不顾国际法，又变化多端，所以在外交上常造成自相矛盾和处于被动。后来不但在国际上显得尴尬，在国内也很难对人民作交待，而不能不继续进行隐瞒和造假。例如中俄边界问题，对苏“一边倒”时，一再说苏联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过了没几年，一旦交恶，又大张旗鼓地宣传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逼着对方以承认这点为解决边界问题和立新约的前提。一直到后来要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了，却不敢向人民宣传问题到底是怎么具体解决的。即使在官方报刊上，也看不到达成协议的详图。至于以前强调的唐努乌梁海更不再提起，连十月革命后苏联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最后是怎么划分的也不便公开宣传。这类自己制造的被动还多得很。又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为了援越抗美，把北部湾一个大点的岛子送给了越南。在同朝鲜划界时，把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几十个岛子让给了朝鲜，长白山和天池也让了一半。这些也都不能提了。可见外交上设禁区，对当局也并不有利。因此我想在打开禁区上带个头，让外交不再对内神秘，没有必要保密的事也不必继续暗箱作业。

三是希望能够对过去外交工作允许争鸣讨论、总结经验教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起点推动作用。如果强调一贯正确和祖宗之法不可违，那只能保护落后、阻碍进步，既不利于国际形象的改善，也会使国内群众对外交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思想混

乱。承认错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一种清醒自信和坚强有力的表现。文过饰非、自命一贯正确，也许可以欺世于一时，但很快就会破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世时是都曾以一贯正确自居，但身后不久，大概除了极少数思想保守和极左，以及利益攸关的人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美国有位前官员曾说过，在朝鲜战争期间如果再同中国开战，那就将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这几乎成了美国人的共识，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并未因此有所动摇。我们能承认中越边境冲突只是对越南的“教训”和对民主柬埔寨的支援，而不是什么“自卫反击战”吗？我们还有哪一个领导人敢再说波尔布特所谓一步到位的社会主义实验走到了中国的前面，值得我们学习？在国际审判波尔布特集团种族灭绝罪行时，我们党和政府敢承认和公开过去和他的关系吗？结果只能是，世界上早已公开，只有中国老百姓被蒙在鼓里。这如同党中央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里说刘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一样，在历史上是不会长久的。这哪里谈得上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

还可举个并无政治内容的小例子。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阵容和形式，也是毛主席创办以来，历届领导都墨守成规，坚持几十年不变的——客主分坐在中间置有花蓝的小桌左右，扭着脖子交谈；而只做样子的陪见者分左右两排雁阵而坐。如有改进，也许只是去掉了毛、邓在时放置的藤椅和烟灰缸。还有，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无论时间多么紧张，事情多么重要，都得在和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会谈后还要挤出时间来拜会人大和政协的领导。在我们，也许是为了四套班子一碗水端平；但对有些讲求实际的客人就可能造成负担，因为他们除了听一些重复的套话和空话外，不会听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这都实在是一种形式主义，为什么不能总结经验，作点变化呢？当然更不会允许舆论界谈论这类事。以前那种重要外宾来，必须有经过多日演习的千百小学生穿同样服装去机场欢迎的仪式，还不是由于李光耀的建议而取消掉的？为什么不许中国报刊谈论？只是一般说说总结外交工作的经验教训，肯定没人敢出来反对。但要真的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评讨论，那恐怕不比骆驼穿针孔容易。在这里也应该反对叶公好龙的现象。

以上所提三点，只是表达个人的希望，能不能起点作用，就难说了。

最后，谈一下对本书书名的考虑。一开始曾想用《对新中国外交的反思》。后来一想，新中国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还是个问题。如果是指中国人民从外国的欺凌下站了起来，那么，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华民国就已经站起来了。那时，英美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中国成了联合国四强（后来加法国成了五强）之一。我们还在延安时就已经在唱四强歌：“中苏英美，四大强国；四大强国大联合，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哎嗨哟！”如果是指中国人民从民国的专制独裁政权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共和国头30年的情况甚至超过民国。所以，我在本书里就采用民国和共和国，而不用“旧”和“新”来称呼1949年前后的中国了。又因中国早已存在，不把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的行为称之为“建国”，也更为恰当。（以上写于2008年6月22日）

补记

这本小书从2008年开始动笔，当时不仅拟好详细提纲，还写出卷首语，但2010年完成第一篇后就进入写写停停状态，一拖就是近十年，直到现在才勉强告一结束。说勉强是因为，现在的书稿已和开始设想的写作计划不同。有的问题大大简化，如中印战争、中越战争和珍宝岛之战，有的没有另写如中日关系，有的不拟再写如中美关系、联合国和台湾问题。原因只是年老体衰，越来越写不动了。曾想打退堂鼓。只是在几位友人的期待和督促下，最后还是把书写完了。近些年的做法是，先由老伴宋以敏根据我的写作提纲、做的笔记和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再由我修改定稿。好在宋以敏也有长期在新闻司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外交部门研究国际关系的经历。

全书不是一气呵成，而是有点虎头蛇尾，有些内容在各篇中还有些重复，不足之处很多，我自己并不满意，但也只能如此了。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就这样拿出来，还是因为深感我们国家要走向宪政民主，摆脱个人迷信至今仍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后国内问题上所犯错误，虽然一直受到各种限制，相比而言，还能陆续得到比较深入的探讨。如何认识毛

泽东对外的所思所为，就不仅讨论更少，争议也更大。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兴起中外学术交流，有一次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和哈里·哈丁来华，遍访国内主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只为弄清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我当时心里就想，哪里有那么复杂的决策机制，就看毛泽东（接着是邓小平）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就全都明白了。我这本专谈毛泽东（兼及邓小平）外交的书，只想起一点抛砖引玉作用。 ■

2017年9月16日

【序跋】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序

——读韦文德回忆录有感

孙国光

本书作者韦文德是我在柳江县三都中学教过的学生（1963级初中），他的哥哥韦文学是我在柳江中学教过的学生（1959级高中）。自我1968年离开三都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当他于2012年在柳州市又见到我时，已经相隔45年，我已岁近耄耋，他也年过花甲。他那中学时代孩童般的天真稚嫩已是无以追寻了。从他那沧桑的容貌和眉目间的坚忍神情，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生活的艰辛和思想上的成熟。知他历尽磨难之后，如今事业有成，衣食无忧，儿孙绕膝，家庭美满，知足之情溢于言表，甚为欣慰，师生之情愈久而弥深。

作为他的老师，对他文革中的遭遇略知一二，对他的牵挂也常萦绕于心，如今他突然笑立眼前，让我莫名惊喜。他知我文革后曾在柳州师专和柳州市教育学院专事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他拿来这本他多年撰写的回忆录文稿让我给他看看。于是我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写的《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的回忆录，全书共有五编。开始他只是给我送来了第一编文稿，我从中了解了他的家乡，他的家庭，尤其是他那畸形的童年生活。从而

引起了我想进一步了解他独特的另类的人生经历的渴望。越往下看，一编一编，竟产生了欲罢不能的感觉。

他的这本回忆录，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写作技巧，而是回忆录中独特而真实的故事。对那疯狂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左倾思想猖獗的生活，他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地主狗仔子的角度展开的回忆，并以其特殊身份所作的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的这些论述不可能都完全正确，他也不强求读者接受他的观点，他只是在展示他的经历和他的人生感悟。他的命运是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在新中国诞生后的30年的历史中，共和国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风雨霜雪都在他的身上和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印痕。这些印痕都在这本回忆录中一一得到展现。

作者在这本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他而立之前三十年的人生经历，读后使我十分震惊。过去那疯狂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猖獗的生活，又一幕幕的重现眼前。文革开始时，他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未成年的孩子，但他的遭遇竟是那样的复杂、凶险、艰辛……这实在是他三十年的苦难史。若从艺术角度去看，这部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若实事求是的说，也不能说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所想都是正确的，但这本回忆录却有着极强的可读性。我认为：首先是它的真。它所描述的内容真，情感真，可谓是事实情真。有很大的感染力。

1950年土改时，他家因有五、六十亩田地，他的祖父、父亲、母亲被划为地主分子，但作者生于1951年，应该说他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因他生在地主家庭而身负原罪，从他出生时开始，便被划入政治上的另册，成了地富子女、狗仔子、黑五类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伴着他成长的只有歧视，困惑、孤独……。地主出身就像是如来佛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阶级斗争的“紧箍咒”一念再念，使他们整整三十年不得安生。

更不幸的是在文革中，他幼稚地相信了造反有理，为了表现自己革命，而陷入了广西的派性斗争，进而身不由己的陷入了文攻武卫的派性武斗中。由于他们的幼稚和天真，他们根本无法读懂当时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周恩来总理刚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支

持广西 4.22 的“8.24”表态，让他们惊喜于自己找对了革命的方向，成为了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眨眼之间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便又宣布了 4.22 是反革命组织。一霎那间，他们便从“革命造反派”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于是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便在全广西刮起了一股十二级的政治镇压的风暴，于是冤魂遍于广西大地，鲜血染红八桂山川。镇压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而出身不好的文德和文德们则处境更加凶险和悲惨，被逼得四处逃亡，隐姓埋名，走投无路，饥寒交迫，惊恐莫名，屡陷绝境……对这种种，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着真实而详细的描述。让人读来不禁发问：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因为本书所描述的事件错综复杂，感情真切动人，读着有时会心惊肉跳，有时会扼腕叹息；有时恨愤交织按捺不住；有时让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有时让人怒怨难平；有时让人意欲攘臂一助。当读到作者殷殷以待的曙光乍现之时，而为他们庆幸！为国家民族庆幸！

其次是本书的独特性。现在反映文革劫难之作，批判极左错误之作已是时有所见，但是以一个狗仔子的角度和身份，来全面真实反映特定时期生活的作品尚不多见。

所谓狗仔子，其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是一个有着百万千万成员的社会群体，文革又将“黑五类”扩大成了“黑九类”，可见此类政治上的阶级异己在国人中的比例已不是“极少数”了。他们在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却长期过着一种另类生活，在政治上受着歧视，遭遇不公，他们都有着独特的感受。那时，什么人权、自由、民主、平等，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剩下的只有阶级斗争，阶级专政，阶级仇恨。作者六岁时，报名上小学就知道不能讲自己是地主出身，到文革中逃亡各地，埋名隐姓，更不敢暴露自己是地主出身。这本回忆录描述了在那特殊年代，这个特殊人群特殊的生活遭遇，凸显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烙印。

再者，这本回忆录有着极强的现实性，文革被否定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人对那时的灾难已逐渐淡忘了。而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劫难的年青一代，已经把那段远去的历史冷漠的当成了故事。今天的中华大地举国上下都在倡和谐、健法制、

重民主，为圆中国梦而励精图治，深化改革。但是有些人却仍然对文革极左那一套念念不忘，甚至在中国某些地方，文革阴魂不散，极左幽灵再现，文革妖火死灰复燃。更令人不安的是竟有许多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人家唱红打黑，继续革命。因此读读这本回忆录，对我们是有警示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作者的学历并不高，在他青少年风华正茂的时期，他是不可能获得读书深造的机会的。但他勤奋自学，博览群书，加之他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所以能写出这部回忆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作了一件于国家于民族，有着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听说他还想要写第二部回忆录，写他在新时期如何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今天这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给了他一个展示才华和智慧的大好机会，企望他能早日完成他的创业史。

■

2013年3月于柳州

【怀人】

增德兄纪念

朱正

几天前，山西友人赵柱家先生把我在1987年9月14日写给高增德兄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我。其中说：

惠寄《晋阳学刊》四册收到，谢谢。见到刊物中夹寄的打印信件，知道了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的计划，很是兴奋。以为这是为学术事业办一件好事。只是承您不弃，要列入我的传略，却使我惶恐起来。看了以往各辑中许多知名的学者，我现有的成绩是无法和他们并列的。如果天假以年，我还想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做些工作。但《传略》应该写的，不是抱负，而是成绩。所以我想请您再慎重考

虑一下，不要责我以违命之罪。

当年我写完就寄，没有重看一遍，以致“违命”错成“违名”的笔误也没有改正。

重看这一封 31 年前的信，真是恍同隔世。那时增德兄主编《晋阳学刊》，刊物有一个《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向我约稿。我回了这封信。这就是我和他订交之始。

1994 年，增德兄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出版，他送了一册给我。其中有我的词条。我记得，我自己并没有写材料寄去，也没有填他们的调查表，完全是据他们搜集到的材料写的，还写得比较长，一些同学术工作无关的材料也写上去了，总之都是说我的好话吧。我感觉到了对我友好的态度。这书至今还是我放在手边常用的工具书之一。

这是一部三百万字的大书，收有三四千位学者吧。可见工作量之大，不能要求它十全十美。我在使用中就有觉得它还不够完备之处，像法学家杨兆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遗漏的。另一方面，也偶有滥收的。滥收的不要紧，不去看它就是了。总的说来，穷一人之力，辛苦经年，做出这样的成绩，也就很可观了。

1998 年，我的《1957 年的夏季》出版，即送了一册向他请教。7 月 13 日给我回信，对我这本书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信说：

朱正先生如晤。

谢泳已将先生大著转至，本人先睹为快，已用二日读过。由于我们都是过来人，起码那个时代的背景是熟悉的，对毛泉之阳谋，至今仍有余恐也。老兄之高明处在于全用公开资料能将一场历史悲剧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场悲剧，并非只是知识分子，而最终意义之悲剧是毛本人！现在反思之，当今之一切弊端，都可导源于那场阳谋。那场阳谋，现象看似乎毛是胜利了，他超过秦始皇的政绩，而从本质想恰是他葬送自己事业之始。有些左派笔杆子爱用“谁笑到最后，才是最会笑的”的这句话，历史已过了四十多年，不知他们意识到了“谁笑到最后”了？有些人向来是“一贯正

确”，恐怕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读后感慨很多，但要让我写书评，却写不出来。老兄之著若与叶永烈之著一比，后者就黯然失色了。

不知老兄下个攻坚目标又是什么？弟甚关注。李锐一本《庐山会议实录》，把“三面红旗”否了；老兄一册《1957年的夏季》，把“一家争鸣”揭了；现在尚无一种可全面揭露“文化大革命”的著作。虽然决议上否定了，事实上却不准批文革，原来难解其因，最近才悟出一点：拭目当今在台上的有权人物（中央到省市）的经历，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秘密。这种人或只反文革初期，却并不反文革后期……一个执政党不敢反思自己的历史，护短自己的过失，只能证明它是一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的政党。

就此打住，不成见识，惹兄一笑。

即颂

夏安

高增德拜 1998,7,13

这信中说：“老兄之高明处在于全用公开资料能将一场历史悲剧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我颇为自负的一点：我并不以罕见资料、秘密资料取胜。至于他拿一本同一题材的书来比较，说是那本就黯然失色了，我却并没有和别人比赛的意思。

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和增德兄没有联系。从赵先生的来信才知道，原来他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这才明白了他没有再来信的原因。赵先生告诉我：增德兄已于2017年5月3日去世，他正在为他编辑纪念集，嘱我作文。我才又想起这一位友好的故人，写了以上这些话表示对他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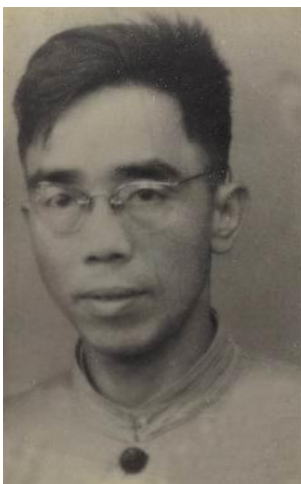
2018年8月21日

【怀人】

文革第一遗书

——雷扶九校长殉难50年祭

佚名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从朋友处看到雷扶九自杀的遗书。雷是我母校柳州铁一中的校长，死于1968年9月24日。

当时，我们在学校“复课闹革命”，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消息传来，同学们窃窃私语，没有悲、没有喜、没有骚动，甚至没有大声议论。一切如死水一般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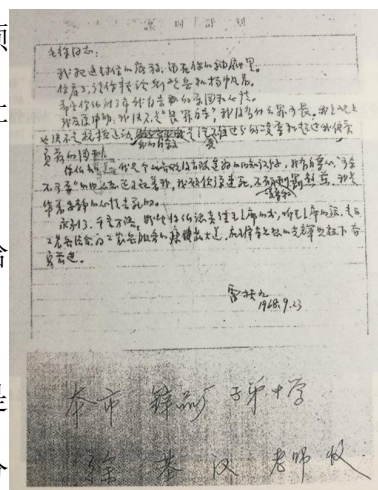
50年后，雷校长的遗书，打破了心中尘封的麻木。作为学生，我觉得应该为校长说点什么，弥补当时对他的冷漠，做为公民，更应该为他的死说点什么，从他的殉难中得出点启示。

我想说，雷扶九校长的遗书堪称文革第一遗书。

文革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公布的遗书不多。网上登过一些名人的遗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邓拓为代表的、希望组织能调查清楚自己是不是三反分子，自觉愧对妻子、子女，以死来解脱他们的痛苦。二是以傅雷为代表的承认反党，但有原罪，“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三是以叶以群为代表的彻底认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这些遗书有个共同点，满纸悲怆泪，一腔赤子情。鲜有不自责，不三呼万岁的。严凤英自尽前直言“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斯人如

此，令人感叹唏嘘。

看过一些资料，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处死的政敌，包括布哈林这样的大人物，留下的遗书无一不自我谴责，称赞领袖对自己的处决无比英明正确。（顺便说一句，布哈林还有一份口述遗书，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让他妻子背下来，若干年后，成为指证斯大林暴政的有力证据）。历史证明，专制得越彻底，言不由衷的话越多。自责，是为了给留下的亲属多一份活的机会。



雷校长不，他不自责，不承认有罪。“我反复申明，我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健康负荷的肉刑”。“我有自尊心，（士）可杀，不可辱的旧思想还支配着我。”

敢在遗书中写下士可杀，不可辱，这在我所见到的所有遗书中是独一无二。

历史应该永远铭记这位南国边陲，蛮荒之地，温文尔雅、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

雷校长在遗书中说：“我是带着平静的心情去死的”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决绝。

死是痛苦的，自杀尤其需要巨大的勇气。培根说“人心中有许多种情感，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仇恨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雷校长是什么情感战胜了死亡？培根说的都有，但都不准确，他是怀着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视死如归。“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

雷校长的遗书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遗书是对被关押期间住同一个房间的老师写的，放在老师的抽屉里，信封上写着老师爱人单位名称，让人误以为是从外地寄给老师的一封私信，从而躲过当局的搜查，他根本就不想让当局看到这封信，他藐视那个当局，不相信那个当局。

有位著名评论家说““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

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这或许是实事，或许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幸亏有个雷扶九，从容的选择了杀身成仁。他的鲜血向世人宣示中华民族“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在20世纪的非常时期，没有断层，没有断流。一脉相传，生生不息。倘若，那个时期自杀的遗书，都是三呼万岁而后死，中华民族的历史该是多么的悲凉。

雷校长是省政协委员，高级知识分子，是建国前从柳铁一中的前身扶轮中学参加革命的，彼时他执教高中，条件优渥，家有娇妻幼子，为了心中的理想，抛弃一切，与学生一起奔赴游击队。他不是党员，学生中有的入了党，成了他的领导，在艰苦的游击岁月中，他对执弟子礼的学生仍不忘授课。讲文学，讲文学史，讲要做有骨气的文人。后来被捕，投入国民党监狱，他写信要扶轮中学的朋友想方营救。他不想死，坚信会有个美好的明天。而20年后，他自尽于曾经热烈追求的明天。

雷校长是因不能承受的肉刑而走上绝路。他究竟遭遇到什么样的肉刑？《柳铁一中建校60周年纪念丛书》中，有文章描述他受的刑罚；剃光头、挂牌子、打着赤脚站在滚烫的铁板上。拳打脚踢。一个黑帮份子该享受的待遇他都领略了。

恕我懵懂，当时我也在学校，竟然没参加过一次批斗雷校长的大会。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黑崽子，没资格参加批斗会，还是另有原因？

朋友告诉我，批斗雷校长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这是工宣队的策略，要先挖黑材料，然后端出来，开大会斗。可见，工宣队对斗争的对象到底有没有罪，心中并没底。

雷校长自杀的前一天，白天、晚上连轴转的被斗。朋友目睹了晚上的批斗会，参加的人不多，两个工宣队的，两个学生，几个老师，还有有几个驻地在附近、跑来看热闹的解放军战士。有个小战士指着雷校长厉声说，我亲眼看到你在指挥武斗。这是无稽之谈，连主持批斗会的人都不相信，没追问下去。那些批斗雷校长的老师，也许明天会被学生押去

批斗，但今天在这里，个个义愤填膺，一位过去深得雷校长器重的老师，几乎歇斯底里扇雷校长的耳光，将跪在地上的雷校长踢倒，然后又拖到讲台继续批斗。朋友看不下去，悄悄的离开。第二天便传来噩耗。那个晚上的批斗会，成了压死雷校长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这一切都很自然。匆匆忙，所有的人又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总该沉淀下来点什么了。

我想，为什么素不相识的小战士也要跑来骂几句？为什么朝夕相处，本是同根生的老师要丧心病狂的折磨他？答案只有一个，疯狂的阶级斗争，使人丧失人性、理性、亲情。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人人都力求站在当局的这一边，对斗争对象无所不用其极，以获得当局的首肯。看过一篇回忆文章，文革初期，政治局开会批判陆定一，周恩来愤怒的把手中的茶杯朝陆坐的方向砸去。这是总理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动怒。他与陆有什么不共戴天的矛盾？没有。从周当时的处境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表明立场，自我保护的举动。睿智如总理之人，尚有此等行为，更何况凡夫俗子乎？

在阶级斗争膨胀到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暴政是必然的产物。人人都可能成为助纣为虐者。大部分当权者，既有挨整的经历，又有整人的本事。文革中被整得最惨的当权者，平时整人也最狠。只有知识分子除外，永远是被整对象。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当执政者把阶级对立、意识形态对立、宗教对立、族群分裂作为治国理念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暴政。希特勒的族群分裂，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意识形态的对立，杀死了400多万苏军俘虏。斯大林的阶级大清洗，从1929年到1953年，镇压了一千多万阶级异己份子。柬埔寨的波尔布执政三年，全国非正常死亡超过1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指引下，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逾百万。所幸中国共产党主动纠正了错误。改革

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不管犯过什么样的错误，走过什么样的弯路，只要没挑起阶级对立，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有目共睹。

雷校长自杀了。他的死给当时柳铁一中蒙难的师生换取了一点生存的空间。因为他和稍后另一个化学老师的自尽，引起铁路局当政者的不满，工宣队长，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和一批队员被撤换。极左的作法降了温。

真诚的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造就象雷扶九校长这样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士的环境趋之于无。

安息吧，雷扶九校长。■

【述往】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中）

王理

十

据说在文革爆发前夕，有人在给毛泽东反映北大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时，用一句话“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来比喻，毛看了后只改了一个字，改“浅”为“深”。

姑且不论其对错，我倒是觉得用一字不改的原话来形容当年顺义县城关中学的政治生态环境倒是比较贴切。不妨来看看能反映出学校内政治博弈情形的几件较重要的事。

第一件大事是1968年的寒假过后，刚开学不久，一位到任不到一个学期的年轻老师高凯被开除了公职。

高凯是山东师范学院1966届毕业生，祖上三代贫雇农，文革中他是山东临沂地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分配来北京前，驻山东师院工宣队和革委会主任当面对他说：“66届毕业生还没开始分配，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提前分配你去首都北京，是要你去接受一项

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他高高兴兴地来北京报道，没想到到了北京市教育局，二话没说直接就让他到顺义县来报道。

我来到学校以后就与他暂时同住在一间教研室内。这位山东汉子为人豪爽热情、心直口快、目光炯炯有神，他主动告诉我：到学校的第二天他就当众正式宣布支持造反派。我当时心想：你新来乍到，又不了解这个学校两派群众以往的情况，也未免太急了点儿吧！

他对把他分配在这所偏僻的农村学校当教师非常不理解，用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发牢骚：“奶奶的！分到这么个破学校叫我怎么保卫毛主席？不行！我还得回山东去”。

到1968年寒假，高凯任教还不足一个整学期，就回老家度国家规定的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走前他告诉我，山东是他们造反派掌实权，他回家马上就办调回山东的手续。一个月后开学了他仍未归校。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人蓄意所为，在寒假期间县教育局突然制定了一条新制度：为了强化教育系统规章制度的权威，规定凡是不请假擅自离职一周以上者，开除公职。这就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开学后一周多了，高凯还未归校，有一天（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女性）突然召开全校大会，宣布高凯违反制度，擅自离职超过一周被开除公职。全校哗然！多数人的看法是地方实力派有意打击报复高凯，许多人为高凯愤愤不平，但也有人私下窃喜。

另一件大事发生在1969年中“杨、余、傅事件”出来不久，前边提到的那个“武霸”奸辱女学生的事情败露了，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我们几个“新老师”用高凯的事情与他比较，力主开除“武霸”公职，他的同伙在多数人的强烈谴责声中不敢为他辩护，最后县教育局还是开除了他的公职，当然有人为此对我们几个“新老师”耿耿于怀。

至于那个“文霸”BXL在人们心目中印象有多差，不妨听一听一个出身很“不好”、被他欺压多年的老师，借“整党”运动中群众可以大胆评议党员的机会，在全校大会上是怎样对他做了入木三分、恰如其分评价的，这位老师说：“BXL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员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级发给我们学校一张购买自行车或缝纫机的凭票，他就该理

直气壮地说了：‘这张票得是我的啊！因为我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嘛！当然就应该是我的嘛！是不是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此话一出，我马上留意了一下B某人的适时反应，只见他板着脸、低头凝视前方、深深地咽了一口吐沫，我猜想他咽下去的一定是对这位老师无尽的仇恨。

整党结束后他不得被调去了别的学校，这显然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但与此同时却把一位老实巴交的党员、革委会副主任也给调走了，我猜想这大概是上级领导出于政治“平衡术”的考虑吧。

十一

我的平稳日子并没有一直继续下去。大约在1970年中，调来了一位新的革委会主任，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并且一步步走向无底的深渊。

之前的第二任主任叫甄君良，是从木林公社书记任上调来的，此人朴实厚道，为人诚恳谦虚，没有一丝轻视知识分子的架子，在教职工中的威信很高，很看重我们这些从北京分配来的大学生。但他的身体很不好，有严重的肾脏病，面黄肌瘦、精力不足，不堪负重学校里没完没了的繁杂事，勉强干了一年，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调他去了县水利局。

新调来的主任叫GP，文革前是顺义县办公室主任（科级），文革开始死保旧县委领导，站错了队，被下放到一个公社。调他来当中学革委会主任等于重新起用他，自然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此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霸气十足、“气度”非凡，好似在他眼里谁都不在话下，俨然一副大干部、老干部的派头，其实年纪不算大，大我顶多六七岁。此人块头不小，心胸却不大，看人时总是投向对方一种满腹狐疑的眼神，令人很不自在。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一句可能并不正确的俗语“穷山恶水出刁民”。

据说他出身于离开县城60多里、顺义县最落后的一个山村里，晋升到县城工作后，就

把原来在农村老家的“土”老婆给离了，连孩子也不要了，在县城的师范学校找了一个“洋”学生重新组建了家庭。

新主任 GP 到任伊始，立刻摆出一副定要“重整山河”的气势。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文革以来，我倒了霉丢了官，被整到乡下几年，现在形势终于变了，我终于熬出了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文革中一部电影中的一句很著名的台词）。

此时的我虽然差不多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并且从上初中起至今，没有一年不去农村参加劳动，可是实际上我对农村并没有深刻的了解，我那一点简单的阅历不可能使我具备如此高的智商，使我能预判他那狭隘诡异的内心世界。直到我意识到他包藏祸心，并且真切地尝到了苦头之后，方才明白原来他是创造性地把毛泽东的本已是极端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利用、改造”——变本加厉发挥到了极致，那就是只“利用、改造”而绝不“团结”，取而代之的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自从 GP 来了以后不久，我就察觉到学校的气氛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首先一点，谁都会注意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大会小会上，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发表一番气势轩昂的训话，使人琢磨不透他这一番高谈阔论的缘由和目的，而这是前几任领导不曾有过的异常表演。比如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就不信一个人你能一贯正确，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谁来了你都是正确的代表？”我听着，总觉得他是有所指的，可是这是指谁呢？

再比如他还多次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阐述过这样的意思：“解放后这么多年，搞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我就不信你的家庭成员中以及你的社会关系里面，就没有出现过一个问题吗？”这话听起来确实也对！可是又不能不使人去联想：你既然这么说，就必有所指吧？可这是从何说起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差不多就在他来后不久，即 1970 年中后期，从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后的一拨红卫兵大学生，陆续被分配来学校，足有七八个。这些年轻人带来了一股朝气蓬勃、无所顾忌的新气象，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好动好玩的天性。比如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下围棋，这个喊“挖”，那个叫“长”，另一个嚷嚷：“还不赶快‘断’，真是臭棋篓子！”……。我很喜欢下

象棋，但从来没下过围棋，这些奇妙的围棋术语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好奇心，只要有人下围棋，我必定凑过去围观，并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慢慢地也就开始入门了。

学校里的这个新变化当然会引起 GP 的极大关注，他在全体教职工的会上危言耸听地强调：“咱们学校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股势力，暗中与组织对抗，现在这股势力好像还壮大了，他们自以为学历高，看不起贫下中农出身的党员同事。可是你别忘了你们受的那些教育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反动教育，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夹着尾巴、放下臭架子、虚心接受改造，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这话表白的够明显的了，傻子都明白“一股势力”指的是谁。

十二

与此同时，学校还有另外一种变化，那就是 GP 在校内外不断网罗“自己”的人。校内有的是积极投靠者，当然主要都是本地人；校外主要是网罗从外地调回顺义家乡的人，我各举一例。

校内一位 M 女士，从师院数学系本科 4 年毕业，在她身上我实在找不出一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应有的风范。生活邋遢、其貌不扬就不说了。业务上一塌糊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曾当众大言不惭地说：“我就始终都搞不清楚数学里的“充分性”和“必要性”的区别，老是把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搞混了”说完了自己还哈哈一笑。

学数学的人都知道数学系有哪一堂课上不讲定理、引理？哪一个定理或引理就其内涵而言，不涉及到充分性和必要性这种基本概念？我真不知道她的 4 年数学系学习生活是怎么熬过来的？再说了，这些概念说得广一些应该是个哲学范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概念，只不过数学用它们多一些而已。说得窄一些那就是生活中谁都要使用的一些常用术语，怎么可能搞混？

不知道是否由于到城里念了 4 年大学受到了什么刺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对大学

生无论男女都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心态。凭借贫农出身的优势，为人霸道，颇似一个混不讲理的泼妇，曾被前任革委会主任怒斥为“混娘们儿！”。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在政治上却表现出常人难及的“高水平”，尤其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上，常有“精彩纷呈”的表演，令人刮目相看。她很快就得到 GP 的极度赏识，并把她推荐为顺义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作为城关中学唯一的代表出席全县的“讲用大会”。后来很快被 GP 发展为中共党员。

从校外网罗来的党员中，有一个 H 姓党员，他满头白发年纪较大，满脸皱纹颇似刀刻出来的一样，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党员。此人很不简单，他出身于顺义县李家桥一带有名的 H 家大地主家庭，1957 年在火热激烈的反右运动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最终“火线”入党。可以想象他在反右斗争中“左”到什么程度！此人一到学校就被 GP 安排与我同一个宿舍住，与我关系很好的原室友（北师大毕业）被调去别的宿舍。显然这是为了全天候监督我的一言一行。

十三

1970 年中，市内各大专院校已经开始大肆抓捕“五一六分子”，由于“五一六”组织是文革中才产生的，所以“五一六分子”的主要对象是文革中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大学生。

进入 1971 年后就逐渐波及到刚分配来我们学校的这一伙年轻人，其中一位体育老师大郭被“群专”了起来，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诸如说他带领着体育大学的红卫兵，冲击中南海北门，还形象地说他带头振臂高呼：“冲啊！”就冲进了中南海。大郭被“群专”隔离后，一天 24 小时由专人看守，给他办“学习班”，不准离开学校，晚上睡觉也不许熄灯。

我早就发觉 GP 瞄上了我，看守“五一六分子”的任务自然不会再让我来管，我当然乐得其所。GP 及其手下一帮人多么想把我与“五一六分子”挂上钩，实在苦于背景、时间、

地点等难以与我有重合点，几经试探只能罢手，但这也增强了我的警觉性。

大郭不愧是一条硬汉，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出身又好，根本不把宣传队和领导放在眼里。有一次他要上街买凉席，给看守他的人打招呼，看守他的人马上向宣传队的军代表老李汇报，遭到老李严词拒绝。大郭头也不回、径直往校外走去，还说：“老子就去，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事后除了批他态度极端恶劣、不老实交代罪行之外，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被“群专”起来的人的精神压力有多么巨大，别看大郭态度那么强硬，内心世界绝不可能那么简单。我从北大毕业后在卢沟桥农场劳动改造那一阶段，表面态度也是强硬的，可是内心里非常痛苦，甚至有过不想活的念头。

不妨再举一例，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叫王志清，在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在宣布他被隔离审查的当天晚上就上吊自杀了。该同学可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在大学时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平日大大咧咧爱说爱闹，出身好，说话随便，喜好文体。尤其喜欢打乒乓球，打得相当不错，常与我切磋球技。谁也想不到他会自杀，可见他当时内心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大郭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九一三”事件后，国庆节刚过我就得到了“小道消息”。大郭这时正被押解在学校自建的学农基地监督劳动，我借着带学生到学农基地劳动的机会，抓住一个不被人发觉的机会，偷偷地告诉他：“林彪出事儿了！估计你很快就会没事的，你可得挺住了，千万别想不开”。其实这仅是我的猜测而已，主要是为了给大郭一点安慰和鼓励，并非我料事如神。到十一月中下旬，“九一三”事件公开了，果然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随即烟消云散，大郭没事了，白挨了一顿整。事后大郭说他连中南海的北门在哪都不知道，那个年代整人是不择手段的。

文革中被“群专”起来的人中，确实有想得开的，但不一定就是看起来态度强硬的人。

我听说北航还是哪个学校的一个被“群专”起来的“历史反革命”，被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他的胸前挂着一个写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手里拿着一个锣，一边走一边

敲一边还得“自报家门”：“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xxx……”他正这么嚷嚷着，看见他小儿子就在不远处，他马上站住，转过身来冲着他儿子大声说：“小三儿！你现在就回家把蜂窝煤炉子的盖子打开，小心别烫着手！待会儿爸爸游完街回家给你下面条吃”，说完，又转身接着再继续敲他的锣、继续说那一串“自报家门”的套话。

十四

自从 GP 来了以后，学校的政治气候的变化，确实越来越明显。像前边提到的那个 M 姓女教师这一伙人，显得扬眉吐气，走路的步态都不一样了。喜欢下围棋的一伙人，开始的时候总喜欢在宿舍门口摆摊聚众、连说带嚷嚷地下围棋，后来不再敢这样了，棋瘾来了只能龟缩在某个人的宿舍里下，也不敢再大声喧哗了。我则是从开始时候饶有兴趣的围观、甚至跃跃欲试也想下一盘，到后来完全远离他们，只为不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任何口实。

当我感觉到城关中学的“天气骤变”以后，意识到两年多来，我一直坚守着的看专业书的习惯必须得改一改了，我把我的所有书都藏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别人不理解的外文书。但是人的习性总是难改的，时不时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自己却完全没有察觉。

记得有一次我听说，乔冠华出席完纽约联合国大会后，带回来一本《英语 900 句》很不错，还听说王府井外文书店就有卖的，我赶快就买了一本回来，书皮儿是蓝色软塑料包装、不怕折的那种，当时一般的书皮还没有这种包装的，我非常喜欢，无意中放在了我宿舍的桌子上，我只顾了欣赏，忘了藏起来。有一天几个教英语的年轻老师来我的宿舍聊天，其中一个拿起我桌子上这本《英语 900 句》感慨地说：“你还舍得花钱买它？我是学英语、教英语的都舍不得花这个钱！”我的那个党员室友很不自然的笑了一下。我立刻警觉了起来，他们走后我赶快收了起来，并对我的室友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嗨！我买它只是好奇而已，其实对我一点用也没有！”说完后又觉得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再怎么解释也难以自圆其说了，都怪自己一时疏忽大意。

这本《英语 900 句》很厚，花了好几块钱买的。当时一瓶贵州茅台酒才 5 块钱（我就在县城的食品店买过一瓶，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与几个光棍儿难兄难弟一块喝了）。你说你是好奇才买的这本书，人家谁信呢？

从此以后，直到我离开顺义县，我再也没敢看过一次专业书，即使在节假日也如此。我把所有的专业书、外语书全部压在箱子底层，包括那本《英语 900 句》。目的就是为了给党组织和同事们留下一种好的印象：我是安心扎根农村，绝对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

我在行为上的这种变化，除了受到校内政治气候骤变的制约外，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对国内政治形势走向的判断。极左愈演愈烈的现实，使我在文化革命初期的那一份热情、期盼，逐渐丧失殆尽。

“九一三”林彪事件震撼了中华大地，也彻底震醒了我，彻底颠覆了我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信念。

十五

俗话说：“人不能和命争！”看来我以往的想法和做法太过执拗。人，是社会的人，必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而现实往往是严酷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无法对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可惜我清醒得太晚。

当时，我的现实是什么？想去的单位去不了；父亲去世了，没有了依靠，兄弟姐妹自顾不暇，也无法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女朋友自从与我一块分配到顺义，一直对我“逼婚”，被我一再拒绝，我给出的自认为“深谋远虑”的理由是：“一旦结婚，咱们俩谁也走不了！反之不结婚，我们只是同事关系，将来我先走，再调你”就这样拖到 1971 年中，她在万般无奈下，选择了离开，在城里找了个主，等待将来调回城里。

我感到无助、凄凉，但不颓废！越是困难，我越不想服输，这是我的性格。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预感：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只能在顺义农村度过了。

既然要正视现实，既然要做留在农村的准备，该怎么做、做什么样的准备，就是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

怎么个“留”法呢？

首先我想到，必须与“地方主义实力派”们搞好关系，正所谓：“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由于我看清了“地头蛇”们的特质：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嫉妒成性、能力低下却不求长进、孤陋寡闻却唯我独尊。所以在他们面前，至少在表面上我必须“俯首称臣”，万万不能触碰他们的个人利益，小心翼翼不能伤及他们的自尊心。

有一次 GP 主任，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和考虑，在我面前双手叉腰，炫耀他的马列主义哲学水平如何如何高。他说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还曾经在北京市委党校，集训过两个月的哲学理论，使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我赶忙奉承，说：“市委党校那个地方与顺义县党校可大不一样，那是专门培养党的高级理论人才的地方！一般水平的人是去不了的。”听了我的吹捧，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晚上，在顺义县医院的饭厅，召开县文教卫直属系统的一个什么大会，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参加了。会上除了县教育局领导讲话外，GP 主任也讲话了。这种会我一般很难听进脑子里几句。GP 讲话时，有一个词他说了好几遍，头一两遍我根本没往脑子里去，说了几遍后，终于给我灌进脑子里了。他说：“哲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范 tao”，接着，范 tao 长范 tao 短地说了半天。我不清楚“范 tao”是个什么东西，不清楚就不想了吧！不知怎么一闪念，我突然意识到：他说的是“范畴”吧？他是不是把“范畴”唸成“范涛”了吧？

我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一个人露出疑惑的反应。我再低下头碰了一下旁边的一个老师，问他：“GP 刚才说的‘范 tao’是个什么东西？”他说他没听见。我刚想说是不是他把“范畴”唸成“范涛”，突然我意识到：“不能再问了！万一明天学校里传开这事儿，追查到我这儿，我可就犯下弥天大罪了！一辈子再别想翻身了。”

此后，我再也没敢提起此事。至今，我也不敢保证我的猜测是对的，但我也真是不知道，他讲的哲学中的“范 tao”是什么？

这便成为一个永世不解之谜！

十六

自从 GP 来了以后，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尤其是我，倍受排挤、敌视、打击。对我，还有的可说，因为我对“文霸”、“武霸”毫不客气，可能伤了他们一伙人的感情。可是新来的这一群红卫兵大学生并没有得罪谁！为什么也要敌视他们呢？

再说了，我对“地方实力派”中的其他人一向是很谦让的，不仅没有利用“群众代表”的身份整过任何人，反而对他们是有过“贡献”的！比如对那个把“红宝书”压在床板下的老师，他可是“他们的人”，是我第一个站出来主张给他不要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呀！再如对在文革初期他们“保”的那个学校的“走资派”，到后来，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都坚决主张给定为敌我矛盾，而我一直主张定为人民内部矛盾。

在我仔细探究“地头蛇”们敌视我缘由的同时，必然会联想到另外一些人，他们也是从市内分配来顺义工作的，可是他们与“地头蛇”们的关系显得很“亲近”，有时简直“近”得像一家人。如此大的反差不能不使我探究其原因。

最终，我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有一对从北京政法学院政教系毕业的夫妇，妻子与我是同事，是政治老师；丈夫是中共党员，分配在顺义县进校工作，工作条件及其性质当然就和初中教师很不一样了，而且他与县教育局的头头来往频繁、关系比较密切。他常来我校找他妻子，GP 见到他总是很客气、很礼遇，并没有敌视的目光。

从北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小严与我同时分配来顺义，由于是中共党员，直接就留在县教育局办公室，给领导做秘书，倍受领导青睐，其青睐的程度可从后面我将要说的一个事

例可以看出。

更让我惊讶的是下边这个例子。

从北京市东城区某中学直接调来我校的赵女士，她在原学校只是做共青团、红卫兵工作的普通党员教师，调来我校，摇身一变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成了校级领导。

她作为校领导，对我倒是没有摆架子，反而还关心我的个人生活，与我谈过几次话。透过谈话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舍得放弃在市内的家，宁愿来生活不方便、闭塞落后的顺义县。

原来她在文革前是领导的红人，文革开始后她遵循1957年反右的逻辑，“保”领导、整群众、在校内大抓反革命，把两派群众组织都得罪了，群众关系很差。革委会成立后，她觉得自己在校内实在没有立足之地，凭借着她爱人与顺义县教育局头头能说上话，就调来我校，离开她的那个“伤心之地”。

让我惊讶的是，她调来我校工作还不到一年，好像没费任何周折，非常轻松地又调回了市内工作。大概是由于她调来顺义县前，完全没有想到农村的生活与市内相比，居然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宁可放弃当校领导的官位也要返回市内工作。

我为什么惊讶？我校有好几位从下面各公社的学校调来的老师，都是家在市内、有着各种各样难以克服的家庭困难，迫切需要调回市内工作以照顾家庭。他们已经向各级领导苦苦哀求了许多年，才从下边的公社调到我校来，为他（她）们周六下午返回市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这已经是大大地开恩了！要想最终调回市内彻底解决家庭困难，那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而赵女士穿梭来往于东城区与顺义县之间是如此的容易，不是因为她是中共党员，是“组织”的人，还能因为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种种的事实教育我：一张“党票”是何等的珍贵啊！我悔不该当初在整党“吐故纳新”阶段错过了大好时机，如果那时我被“纳新”了，现在我不也是他们的“自己人”了吗？我不是也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么？

于是，我推断：如果我将来不能依专业需要的理由调离顺义县，而只有“留下”这一

条路，那么要想平平安安地在顺义县生活下去，必须入党，别无选择。

十七

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我必须努力修补与“他们”的关系，从我做起。GP 说一我绝不说二，GP 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除了星期天我往城里跑外，平日里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谁有困难我帮助谁，尤其对“他们”的人，我更是小心翼翼、事事谦让。很快就让我当了年级组长，负责全年级所有班级的教学工作安排、政治活动以及各项日常工作的“领导”工作。

大概是在 1971 年上半年，上级决定要我们学校开始设立高中部并马上招生，这是学校自建校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负责教学业务的一位“小”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教高中班的数学，我当然一口答应，不能推辞。谈完话，接着我就回老家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了。

返校后，这位“小”领导再次找我谈话，说：“某某某老师找了我，主动请缨要教高中班数学，经向 GP 主任汇报，GP 主任同意由他教高中班，你看他教得了吗？”我当然给了他肯定的答复，并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安排，我还说我教初一年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更合适教初一年级。

我的这个表态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明白，自从 GP 来校当主任后，自己在校内的处境是一种“江河日下”的严峻态势，我只求默默无闻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去抢这种毫无意义的风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告诫刘备的那句名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我的准则。

这位主动主动请缨教高中的老师，他高中毕业后，只上过一年大专，平日在业务方面不思进取，却心高气傲。当他讲到“对数函数”这一部分内容时，私下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老王，你说，这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都是从同一个式子出发引入的，已经引入了指数函数了，有什么必要还要再引入对数函数的概念？”我一听他这个毫无道理的问题，

先是吃了一惊！马上意识到我不能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如果要认真回答他的问题，必然首先要纠正他的错误概念，可他是“他们”的人，万万不能伤及他的自尊心！这可把我“难”住了，我想了一想，只好言不由衷、模棱两可地说：“引进对数函数的概念，大概可能是为了方便一些吧！”

后来，当他讲到“三角函数”部分时，他给同学们总结了63个公式，要同学们每天背5个。有一天，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很聪明的学生愁眉苦脸地来找我，问：“王老师，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公式背下来的？有什么技巧，您教教我”这等于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对他们师生双方谁我也不愿意伤害。想了一下后，我只好建议他：要牢记定义不得含糊，再记住三两个最基本的公式，然后自己练习着去推导出其余公式。最后我又巧妙地安慰他：“这样做了，你最终就能背出老师让你背的那63个公式了”其实我的潜台词是：最终你就会自我发现，其实根本用不着死记硬背那63个公式了。

十八

进入1972年后，一方面，由于前不久林彪事件已在全国范围内公开传达，并随即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但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务院狠抓落实“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进行“整顿”，一时间，极左的政治气候出现了一点“衰退”迹象。全国上下显示出一些“新气象”的感觉。不过，很快随着毛泽东力挺的“四人帮”更趋得势，这一段短命的“新气象”又被批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回潮”，这是后话。

我们学校的状况随着国内大气候的变化，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不仅有了高中部，而且教职工人数翻了一番还多，早已过百。不过，最实质性的变化还应该是本地人的数量变为绝对的少数，这就意味着具有大学学历的教师，不仅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各个学科的骨干教师全是从北京市内分配下来的大学生。

以 GP 为首的“地头蛇”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别看你们这些“臭老九”人数占优，可权柄依然在我们手中，你们的命运还牢牢地掌控在 GP 主任的手中。“足智多谋”的 GP 开始变换他的统治策略，也许可以称之为“欲擒故纵”计。

大约在 1972 年底或 1973 年初，学校的行政编制做了一个大的调整，设置了 3 个组：政治组、教育组和后勤组，统领学校的一切日常工作。在事前完全没有征求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至少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突然宣布：政治组的组长为张某某，教育组的正组长是我、副组长是高石曾老师，后勤组组长是武某某。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引起了各种猜测。政治组和后勤组的两个组长都是党员，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令人费解的是，学校里的党员并不少，为什么偏偏在最有“实权”（其实是最繁重！）的教育组两个组长的位置上，放上两个非党员呢？

面对如此诡异的人事安排，“地头蛇”们中的一些人沉不住气了。其中，在前边提到的那个被前任主任怒斥为“混娘们儿”、却得宠于现任主任 GP 的 M 姓女老师，跑到 GP 面前公开大吵大闹，表示抗议。据说，GP 很“生气”地当面批评了她的愚蠢行为，但又不能泄露“天机”，最后私下怎么安抚她的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GP 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当时只是善良地猜测他可能是为了有效地管理这帮“臭老九”。我知道他清楚我在这帮人中间还有一点威信，而副组长高石曾则是一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追求执着、经验丰富的语文教师；我猜测 GP 可能认为我们俩一文一理搭档配合，不会有人在业务上不服从管理。后来的事实说明我还是太幼稚了！

十九

在 1972 年，我还有过这样一个小插曲。

在 1970 年到 1971 年期间，北京市把一大批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红卫兵大学生都分

配当了中学教师，而且多在远郊农村。他们人多势众，组织起来多次到紧挨着王府井的市委大楼前“闹事”，要求专业归口重新分配。最后，北京市委文教组被逼无奈，果真下发了一个文件：凡是工科大学、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归口重新分配。结果有很多人喜气洋洋地离开了教育系统，其中顺义县木林公社的一个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接到重新分配去工厂的通知后，来我校与他的福建老乡告别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我。

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以为我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兴高采烈地跑到县教育局，找了一位局长说明北大确实是综合性大学，北大生物系毕业的xxx分配在木林公社中学，你们已经按市委精神让他重新分配了。我也是专业不对口，符合市委文件精神。没等我说完，这位局长脸一沉，把我足足教训了一顿：“我说同志！你口口声声‘专业！专业！’，你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搞的是‘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你所说的什么‘专业’！再说了，你也不是他们这一批红卫兵大学生，你不在‘重新分配’的范围之内，你老老实实在这里呆着吧！”接着又说：“你来顺义快5年了，看来你从来就没有安心于党的教育事业，你要从思想上……”

他泼向我的这一盆冷水，把我泼了个全身透心凉，我都不记得我是怎么返回学校的。

我满以为上级北京市委下达了文件，下级理所应当就该照章执行，谁知“强龙难服地头蛇”，真是一点不假！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暗自思量着：这可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事迟早会被校领导知道的，以后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了。

二十

在“回潮”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纠正校风校纪、克服纪律涣散状态、加强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规范与检查等等方面，有许许多多繁杂的工作要从头做起，教育组几乎揽了全校的所有日常工作。高石曾和我两人配合默契全力以赴，一天到晚高速运转，确实

做了许多工作，大家也是认可的。

但是，就在如此繁忙的工作间隙，我还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为日后挨批种下了祸根。那就是我在我教的年级（8个班）搞了一次数学竞赛。

现在我都回忆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否受了社会上“回潮”思潮的影响？反正我脑子一热，就带领4位同年级的数学老师一起动手做起了准备。又是动员，又是讲解竞赛的意义，又是课外辅导难题等等。学生也觉得新鲜，热情也高，特别是那些平时成绩好的学生，连星期天都主动找上门来，要我给他（她）们出难题做。

党组织领导并没有制止，也没有鼓励。最后竞赛完后，取前10名给发了奖状，前30名做了口头表扬。这中间有一位老师在判卷子时做了一点“手脚”，这又等于给我上了一课，后面再说。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1973年全国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小学生黄帅大战“师道尊严”——“宁做革命小闯将，不做‘5分+绵羊’”；另一件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单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考试制度；还有山东某地两位教师，一位姓侯、一位姓王，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倡议：农村中小学教师应该取消工资，与农村社员一样每天记工分（后被戏称为山东“猴王”倡议）；随后又有“李庆霖事件”（毛亲自给他复信）。

这几件事立刻催生了全国性的对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讨伐运动，并结合批判“回潮”的种种表现。我校虽小，声势却很大，全校师生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讨伐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一中心工作运转。大字报铺天盖地，联系实际批判校内的“回潮”现象。

以往批判“无政府主义”、“读书无用论”等的大字报，都是贴在宽敞的教室外侧墙面上。这次贴大字报的地方又增加了我的宿舍门口外的墙面，以及正对着我的宿舍的、对面宿舍的后墙面上。这后两个地方的大字报，主要直接点名批判我带头搞的那次数学竞赛，批判数学竞赛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是“回潮”在我校的具体表现。

写批判我的大字报的人都是学生，没有老师，所以我比较放心，没太当回事。批判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姓孙的，是个班干部，平日表现很突出，小小年纪政治嗅觉很灵敏，但是

学习能力平平，平日与我关系还不错。我发觉他可能是由于贴了我的大字报而有意躲避我。

过了几天，在县教育局工作的小严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找她一趟。我与她虽然认识，但几乎没什么来往，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见到她后，她首先问我是否在会上发表过维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观点。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她接着说：“教育局领导开了会，决定在全县中小学展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要以你为批判典型，并且要我准备起草文件，发给全县各公社教育系统”。我听后如雷轰顶，大吃一惊！事情已到如此严重地步，我怎么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呢？她还说：“我看军代表老罗有点犹豫不决，我在会后找老罗反应了你的情况，并说你一直踏实苦干、表现积极，不可能有这种错误思想。老罗点头同意我的看法，但不知道老罗能否说服几位局长”，她一再嘱咐我以后说话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听到这里，我立刻明白：除了校革委会主任 GP，谁也不可能有说动几位局长的能量，因为文革前 GP 的“官”比他们都大。

老罗是我校旁边那个师级部队的医院院长，从部队被委派到县教育局“支左”，他夫人原来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化学课的助教，自然也在“臭老九”之列。农大要战略搬迁去延安一带时，她不愿意去，就作为随军家属调来顺义，来我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关系融洽。

返回学校后，我反复仔细思考我来顺义这几年的所作所为，除了发起搞了一次数学竞赛外，实在想不出“他们”能抓住我的什么把柄。可是单凭一次数学竞赛能有多少可批判我的价值？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要把数学竞赛作为批判我的“药引子”，然后再公布我的档案材料，这样一来，“值得”批判的东西就多了！

想到这里，我恨我自己，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你搞什么数学竞赛呢？纯粹是没事找事！你不是想入党为“扎根农村”做准备吗？那你就老老实实在“他们”面前“装孙子”不就完了嘛！

不过，再回过头来想想，我搞数学竞赛也还是有一点诱因的。说来也奇怪，在那个天天嚷嚷着突出政治的极左年代里，每年的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结束后，报纸上居然全文

刊登全部竞赛题目。题目都很难，有的题我想好几天都做不出来，而那些拿了金牌的中学生在短短半天或一天之内就能做出来，真是不简单！从而我就联想到：做题有时恐怕比出题更难，因为出题者可以自行设计“圈套”或“陷阱”，而做题者只能被动地去解“套”。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有道理，希望有识之士见教。

从小严那里返回学校后，我整日如坐针毡，静静等待命运的判决。过了好一阵，虽然批判“回潮”还在进行着，但没有别的异常动静，更没有发文件下来。看来军代表老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终于躲过了一劫。我对老罗夫妇感激不尽！这次的教训足够我牢记一辈子的！此后，我对“他们”确实做到了“服服帖帖”、“鞠躬尽瘁”，但内心想的是：我绝不能“死而后已！”

再说那个带头给我贴大字报的孙姓同学，毕业前特地来与我话别。可能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进了我的房间，涨红着脸、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看着他尴尬窘迫的样子，我就先开了口。我一点都不埋怨他，他积极要求进步，必然会被人利用。再后来，他被保送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时，又来看过我一次。

再说说那次数学竞赛的一个小插曲。在赛前，几个老师坐在一起闲聊时，我无意中说到我教的其中一个班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很聪明，肯定能胜出。结果判完卷子，这两个学生名落孙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于判卷子流水作业，我只判其中四分之一，我就复查了这两个学生的卷子，发现有一位判卷老师把这两个学生的卷子中，属于他判的几道题都给了0分。我指出他的错判后，他不好意思地说他没看清楚。经改正后，这两名学生都进入前10名。

此事虽小，但令我大长见识。我发现，我的所有社会知识都来自于自己各种失误的教训，我实在缺乏“事前诸葛亮”的智慧。■

【述往】

独酌翁自述——情爱篇（2）

梁沪生

1966年的最后一夜我彻夜未眠，我们工厂的许多人也彻夜失眠。人们是在一片喧闹声中迎来1967年元旦的。迎接新年的不是喜庆的烟花爆竹，而是人们群殴武斗的呐喊和响彻夜空的高音喇叭的喧嚣。

一场轰动成都乃至全国的被称为“12.31事件”的大武斗就爆发在我当年所在的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厂里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士们因观点不同，先是唇枪舌剑面红耳赤的辩论，发展到你来我往的推搡，继之便是相互的拳脚相加。最后升级成对一座大楼的攻守战。石块纷飞，木棒飞舞，云梯高架，最终以人多势众的攻方大获全胜，攻陷城池而告终。

以上只是本文故事的背景，给故事主人公的一个规定情境。

我其实想讲的是彭师兄的故事。彭师兄是与我同年（1965年）进厂的师兄弟，分在了不同的车间。其时，他虽也从众加入群众组织，却算不上是个铁杆份子。下午开始干仗时，他无动于衷，那阵子双方这样的小摩擦已经习以为常。晚饭时听说事情闹大，就从食堂打了饭边吃边往现场那边溜达。此时楼内楼外正在僵持叫骂，不时有石块飞上飞下。一块鹅卵石蹦到彭师兄脚下，他按捺不住，也冲楼上叫骂了几声。他是属于进攻方这一派的。

吼了几嗓子，刚吞了半斤大米饭的彭师兄觉得嗓子在冒烟，离开现场回到单身宿舍。从小在成都老巷子长大的彭师兄，承袭着老成都人不改的习性：喜好喝茶。先到开水房提了瓶开水，往自己那偌大的印有“先进学工”字样的搪瓷茶缸（这是他进厂后得的平生第一个奖品）抓了两撮“三花”（三花者，三级花茶之简称也。那时候普

通成都人皆好三花，觉得二花、一花乃至特花偏贵，四花、五花不经泡，而三花正好适中价廉物美。)泡上，点上一支烟，吹开还浮在面上茶叶，抿上一口，眯着细眼吞云吐雾，快活似神仙。

那时爱引用一句话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师兄要当快活神仙，可外面分贝越来越高声调越来越激昂的高音喇叭声不断传入他的耳膜，让他一腔热血涌动起来。

当今互联网厉害，有什么突发事件都会顷刻间传遍全世界。那时候的宣传利器是高音喇叭。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或现场助阵，或开进城满街去嚷嚷，声嘶力竭地传播着武斗的信息。从发生大武斗，到酿成血案，再到死伤多人……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不断提高着分贝，也不断提高着伤亡人数！把事实无限扩大，把人们的仇恨升级！耸人听闻的号外传遍全城。相比之下，现在的标题党是小巫见大巫。谣言散播，真假难辨，声援者几乎倾城而动。

彭师兄再也无意逍遥品茶，起身重返现场。这正是城池被攻陷的那一刻。登云梯而上的勇士已将一楼大门打开，一阵欢呼呐喊，宣传车上高音喇叭也适时地响起了冲锋号，进攻者蜂拥而入。守敌被一一生擒，其中不乏顽抗不屈者，更多的是从没见过如此阵仗而吓得战战兢兢的人们。毕竟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女工还占了很大的比例）。

年轻人谁无英雄情结？彭师兄也置身于冲进大楼的人流中，那一刻内心顿时涌起一种攻城拔寨的豪迈感。其实他也不知道冲进去后该干什么，被推拥着进了一个似已无人的房间，他四下打量一番正要离去，身后传来声响。一扇倒下的破柜门后出现一个黑黝黝的人影。看不清人却分明看见一双亮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

彭师兄顿时愣住，这是一双年轻姑娘的眼睛，似熟悉又陌生的眼光。那熟悉眼光似乎有过那么几次回眸一瞥，曾经使他怦然心动。是在厂区上班的人流中？食堂排队买饭的队列中？上台领取奖品的会场上？

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彭师兄伸手抓住那姑娘的手腕，不由分说把她拉了出来，一把扯掉还戴在她胳膊上的对方组织的红袖章，毫不迟疑地拖着她，奋力挤出大门，避开喧闹的人潮，径自朝自己的寝室走去。而此刻，从大楼里被押出的俘虏们正被一个个扭着胳膊穿过一道人巷子，被愤怒的人们拳打脚踢，无论是强悍的还是羸弱的，个个难逃此劫。他们之间，昨天也许还是亲密的师兄弟、互相关爱的师徒……

从离开到归来，估计没超过半个小时。关公斩华雄，凯旋归帐，其酒尚温。彭师兄回到寝室，那缸子三花茶也还未凉。他将搪瓷茶缸递给坐在床沿的姑娘：“喝口茶，还是温嘟嘟的。”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句话。惊魂甫定的姑娘接过彭师兄递到面前那缸茶喝了两口，一股暖流沁入肺腑，砰砰乱跳的心才平稳下来。

当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姑娘困乏不已，和衣靠在彭师兄床上打盹。而彭师兄则端着尚酃的三花抽着烟，听着喧嚣声在门外蹲到天亮。天亮后他亲自将姑娘护送回家。至此，彭师兄才知道姑娘叫小芸。从此，文革弄潮儿们的行列里不再有他的踪影。

那年武斗不断升级，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到了9月14日终于有了最新最高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而彭师兄早已身体力行，实行两派大联合了。武斗结束通知返厂上班时，他和小芸已经喜结连理，恩恩爱爱一起回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来了。彭师兄是我们那批进厂的工人中恋爱结婚的先驱者。早生儿女早享福，之后什么工厂倒闭，员工下岗都没怎么影响到他的生活，家里自有早已成年且出息的儿女支撑。半个世纪过去，而今已年过七旬刚参加过孙子婚礼的彭师兄，正品着竹叶青（早不再啖三花了）幸福无比地期待着四世同堂。

彭师兄所在车间是纺织工艺的头道工序清花车间，而小芸在最后一道工序整理车间。所谓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平时相见不相识。而这武斗之夜却天赐良缘，迎来彭师兄幸福的1967年元旦。

那年头，就连在我们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职员，都以捍卫革命路线的名义，乃至夫妻反目、师徒结怨、兄弟成仇……这样的故事我耳闻目睹甚多，我却更愿意把彭师兄的故事放到前面来讲。 ■

【读者来信】

1. 胡杰：234期的封面设计很有创意

辛苦了！发来的每期都很有价值，谢谢！这一期（234期）的封面很有创意，这和记忆的内容形成一种张力，也是《记忆》的封面设计形成独特的审美。（2018年9月16日） ■

2. 梁幼志：抄录彭丽君书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享

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彭丽君的《复制的艺术：文革时期的文化生产及实践》一书。导论中有一段话很提神醒目，特抄录下来，希望贵刊能刊发出来，让大家共享：

“今天，中国官方努力叫人忘记文革。正因如此，我们便更应该拒绝遗忘，并持续阅读和书写文化大革命。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多空间去阅读、写作、创作和思想文革的，正正是文革的文化领域。”（此书由香港中大出版社，2017） ■

3. 刘敏华：《教育叙事》中的白璧微瑕

我是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搞语文教育研究的。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了王本中主编的《教育叙事》。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有人这么写教育。它分别对十七年中学的语文、数学、体育、音乐、思政和劳动教育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应该说，这对于解剖十七年教育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建议搞中国当代教育史的人都读读这本书。

此书编辑的语文水平都属上乘。但也免不了挂万漏一，尤其是碰到我这个有一种职业病的人，看到一点瑕疵就要说，比如，下面这段话就不那么顺达。说严重点，有语病：

我们知道，这三本分册所反映的仅仅是某些时段，某些实例，某些事件，远远不足以涵盖百年女附中全貌，只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及相关资料。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始终秉持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第七页）

我认为，“仅仅是”三个字应该删掉，“只是”前面似应加上代词“它们”做主语。最后的句子不完整，可加上“的宗旨”。这句可以改成——

我们知道，这三本分册所反映的某些时段，某些实例，某些事件，远远不足以涵盖百年女附中全貌，（它们）只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及相关资料。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始终秉持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的宗旨）。

这类的瑕疵还不止这一处，第七页最后一句，似乎也可以商榷：

一念起已是恩情，一缘起便是万水千山。一年，之于我们参与其中的几十名已不年轻的师生来说，却是一次灵魂的远涉和修行！

仔细体会一下文中的语气，就知道这里的“却”改用“更”或“则”较好。

最后，我再吹毛求疵一回：书中有个别错字，比如把“燃烧”写了“延烧”。■

本刊说明：本期封面取材自胡杰先生的《大饥荒》系列木刻版画。为突出主题，设计者去掉了原版画的背景。本刊已取得胡杰先生的授权和许可。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